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92期

目 录

【编者按】

“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

——再谈文化清理与文化重建

【思想文化】

从查歌片到看黄片

——禁欲主义的报复/刘家驹

“红色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

——再谈“兵团精神”与自救式维权/胡之杨

关于“兵团精神”的座谈纪要/雷霆 采访整理

【百年国史】

请中共党史界记住她

——由罗星原女士重提罗章龙研究资料/邓伍文

【评论】

阎淮著《进出中组部》一书读后

——一位“第三梯队”候选人的独特人生/向 真

【述往】

周扬女儿的回忆：苦难人生十二年（一）

——文革初期，风云突变（1966.6—1969.8）/周 密

【书摘】

文革后遗症的“双重思想”和“认知失调”/徐 贲

【读者来信】

1. 许 浩 2. 余敏玲（台北） 3. 黄孝华 4. 庄菁瑞（荷兰）

5. 于向真（新加坡） 6. 熊猫国王 7. 蒋健

【本刊声明】

【编者按】

“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 ——再谈文化清理与文化重建

1967年，新加坡的李光耀在跟尼克松总统聊天时说起了中国，李光耀有一个很新颖、形象的比喻：“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水一冲，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过中国还会存在下去。”应该说，李光耀很有预见性，他在文革刚开始就看出来，毛式的革命必定是竹篮打水。但是，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毛泽东作画的不是瓷砖，而是制度，是“三观”。所谓人亡政息，不对，是人亡政存。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就是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

制度与思想互动，制度是基础，是保障。思想是卫士，是长城。两者配套成龙，互助互利。“最新最美的图画”并没有完全消失，它还存留在语言、书本、课堂、媒体之中，只不过移步换形，戴上了新时代的面具，藏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身后。外国人看中国的事，貌似新颖，其实隔膜，雾里看花。

三年前，我在一篇千字文中，谈到当今的文化乱象。结束文化乱象，首先要做的是文化清理：突破主流话语的束缚，重新评价“红色文化”。分析其中那些是普世的，那些是一党的，查明“红色基因”在正义性、合理性掩护下的毒副作用。正视它的强大生命力，剔除其中的毒副作用。

其次要做的是，用毛时代的历史，对照改革开放，解答这样一些问题：如何评价马克思的学说？如何评价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中国的几代精英，以追求民主始，以制造专制终？为什么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组织，在延安整风以后，就盛行造神造假，且至今不衰？为什么毛时代盛行的说一套做一套，在今天越演越烈？……

清理是为了立足，有了立足点才能谈上文化重建。重建的基础是民主政治，而不是“厉害了我的国”。重建的标准是普世价值，而不是“党文化”。重建的成果来自自由心灵的创造，而不是来自“国家订货，组织生产”。重建的目的是彻底荡涤文革的遗毒，而不是重振毛体制，复兴“红色文化”。

【思想文化】

从查歌片到看黄片 ——禁欲主义的报复

刘家驹

人祸造成共和国的三年饥馑，三千多万人饿死，高举的“三面红旗”扫地，哀鸿声中，党的大信失坠。在台湾的蒋介石，看到了机遇，嚷着要反攻大陆，企望唤起陈胜、吴广们的内应。在这内困外忧的严峻时刻，四百万人民解放军，受命进入紧急战备。我所在的12军移防苏北地区筑城。

黄海海岸是国防的蜂腰部，平坦辽阔，军委认定这里是老蒋首选的登陆场地，指令我12军要在这里建起有纵深火力的永备性防御体系。这年底，我军5万官兵进入黄海岸边的村头滩地安营扎寨，餐风饮露，夜以继日地进行筑城。任务紧迫繁重，又无文娱生活调剂，仅靠师的电影队每周到各团放一场电影，影片还都是老掉牙的国产片，凡有谈情说爱的，一律被视为对部队有腐蚀作用，连《柳堡的故事》也内定为思想不健康的，不得在部队流通。基层的干部和战士都是些年轻人，干活的疲累能承受，生活的苦行就有抱怨情绪，他们唯一的盼望是星期天到附近的城镇逛逛街，看一场香港拍的电影。我们有个团离县城20华里，假日准予进城的，每个班不得超过两人，他们非常珍惜一个月才轮到的机会。获准进城的人，都得由连排干部带队，大早就出发步行，10点钟前进城，一般都能看到早场电影，中午啃着烧饼观览街景，下午一时左右又整队小跑般赶回驻地。香港片是写家庭、爱情和生活琐事的，富有人情味，战士看得过瘾，他们美名为打了一次“眼祭”。

在战士中还有一种消遣方式，从街头买回些歌片放在口袋里。歌片大小类似四寸照片，一面印制歌词曲，一面是明星的玉照。歌曲有周璇的《天涯歌女》，李丽华的《花好月圆》，白光的《假正经》等几十种，闲暇时，在无人处掏出来哼上几句，再看几眼美丽的倩影。战士更喜欢《柳堡的故事》的插曲《九九艳阳

天》，描绘的是苏北风情，二妹子模样姣好，能让战士怦然心动（作曲者高如星，为作此歌在文革中遭到批判，肋骨被打断捅进肺里发生癌变，他是听着这首歌告别人世的）。

这正是全党狠抓阶级斗争的时刻，凡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以这柄利剑斩尽杀绝。军队的各级政治机关把影星们唱郎呀妹呀的，看成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战士对歌片的流连忘返，是在涣散部队斗志，削弱部队战斗力。军区的宣传部更重视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他们向全区基层发出了清缴歌片的指令，还要求各级文化部门到基层去督促彻查工作的进行。

我们文化处迅速做出部署，先在直属队召开现场会试点，把各连的指导员集中到通信连观摩，由直工处长集合部队，要每个战士携带自己的装具和存放在储藏室的提包等个人全部家当，到连部前的小广场打开自己的背包行囊，指定连排干部逐个细查。歌片人人都有，少的十张八张，多的上百张，片刻工夫，搜出了两千多张歌片堆在地当央，由直工处长当众点火焚毁。

处长还当即宣读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最新指示，大讲唱“黄色”歌曲的种种危害。烈焰下，战士们的眼睛里一片茫然。

被搜过的事务长小陈对我发牢骚说：“最好我们都皈依佛法，去当和尚。”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12军的5万人中搜出歌片40多万张，军区通报表扬了我们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的尖兵。为部队的思想建设筑起一道反修防修的大堤。

改革开放后，世界的先进文化开始涌进国门，我们从反思中惊醒，意识到用阶级斗争清洗战士对美的追求，是干了一件泯灭人性的蠢事。

1972年春，我调任《解放军文艺》当编辑。20多年后的1995年，小陈已是我老部队的后勤副部长，还是小有名气的散文作者，他来京送稿顺便看望我。言谈间，说起部队的变迁，他用一句话概括：物极必反，共军已变成了国军。

我不明就里，请他说说原委。

小陈说：“自你们搜缴歌片之后，我们连在清规戒律中生活了好些年。文革时期，反修防修的各种措施，像上百条绳索，把人的思想束缚得更紧。可到了1980年代，改革的大潮摇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阶级斗争淡化了，部队开始冲破思想的牢笼，一些人走进了另一片天地，我只说几件你想不到的事：

“第一件，1990年代初，我们一位连长转业到市里当了公安分局的副科长，他负责扫黄打非，收缴了几屋子的黄色录像带。一些熟识的干部经常去他那里坐坐，每次去都带回几盘黄带，先是连干们看，后扩大到排长，老兵们知道了，都争着要看，连长怕告发，干脆让老兵也一起看。这阵势比起当年战士们欣赏歌片如何？您别以为我说是个案，据我了解，我们的师、团、营干部大都有黄带，他们之间还自由交换。我把部队的这一现状写成篇通讯《禁欲主义的报复》给军报，他们不敢登，说要强调正面教育。

“第二件，部队常年住城市，大街小巷都有美容院、按摩院、酒吧间，干部们去光顾，都有三二百的人民币出手。战士见干部喝花酒，也不甘寂寞，可津贴微薄，三五人就集资包一回小姐。次数多了，无力付账，他们创造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取财办法，一人抱住小姐亲热，另一个就把手伸进她脱下来的衣服口袋，得手后，还装着很大方的有现金支付。既劫了财，又得了色。很快，小姐们都知道是‘共匪’们干的，一帮小姐集结到军队机关的大门前状告。这场热闹让城里人风传开了，争说窑姐向军队讨嫖资的故事，还越编越玄，说军队已包下多少家按摩院。

“第三件，基层如此放浪，军的一些首长就利用权力行事。改革开放后，军师普遍组建了宣传队，招募来一批能说会唱的女兵，名为丰富部队的文化生活，实为领导提供了性伴侣。一次，柳下惠故乡济南军区的副司令来拜访军首长，一位美艳的女孩子坐在副司令的腿上敬酒。这事是上菜的厨师发现的，故事从厨房传到机关。

“第四件更为离奇：一天，参谋长办公闲暇，推窗眺望，发现隔院通信连女兵宿舍楼前晾衣的铁丝上，搭着十多件花裤衩，参谋长邀来副军长观看，然后两人打赌，谁能把花裤衩主人的姓名说出来，说的少就请吃一桌。两人兴致盎然的各自报出女兵的姓名，但无从判断谁对谁错。参谋长叫来副参谋长，要他去女兵连紧急集合，几分钟之后，女兵们闻听号令，都奔下楼来收取自己的衣服裤衩。最终，参谋长和副军长自己也无法认定谁赢谁输，只是开怀的大笑了一场。

“您别以为这类游戏令人作呕无聊，确实是我军一些高层干部生活腐朽堕落的现状。

“第五件，有的女兵才十七八岁，就被像父辈一样的首长不断地狎昵、猥亵，

以至奸污，她们不知所措，感到屈辱，谁敢声张？眼泪往被窝里流。有的写信告诉自己父母，母亲们义愤填膺，来队找首长抗争，有的向地方法院起诉，法官们一听是涉军案件，犯事者都是大校、少将，谁敢立案？母亲们又上军事法院，得到的回答是：‘军事法院不管民事诉讼。’

“我曾经安抚一个受害女兵的母亲，她哽咽地诉说：‘我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从小就崇拜解放军，今天他们堕落了，而且还是高级干部，伟大长城的基石啊……’。

“第六件：我的一个战友告诉我，他的部队在南方一座大城市开设了三家赌场，领导理直气壮地说：肥水不落外人田，大款们都跑到境外去狂赌，我们把他们的赌资留在国内，又加以保护，上百亿的钱财就不会流走。”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今我军的风貌如何？一些 70 后、80 后退下来的兵告诉我，部队上层的堕落，远不止玩女人，他们能花上一百万买到一个少将。📷

【思想文化】

“红色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 ——再谈“兵团精神”与自救式维权

胡之杨

潜水中看了兵团战友的微信群聊，受到了启发，有了些感想，认识到自己的偏颇，写下来跟大家交流。

第一，关于维权的思想理念，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发布的“宣言”里就有“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中共上了井冈山之后，工人运动式微，争人权争自由等来自西方、苏联的说法渐灭殆尽。中共建政后，尽管维权的事情不断，如 1956 年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村闹事，都有维权的性质，但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不认为这是维权。在官方看来，这是少数坏人/阶级敌人鼓动落后群众搞破坏。在工农学生看来，他们是反对某个具体的政策（如工厂的低薪、农村的集体化，学校的食堂和课程）。在毛时代，维

权成了反革命的专利。实施维权的工农商学也不敢承认自己在“维权”。只有在国门重开，西风再来之后，维权才随之复兴。

第二，判断维权的标准，在于行为，而不在于认识。任国庆说，维权是拔高知青，是知识分子的花拳绣腿。是让自己舒坦好过。理由是兵团人根本没有维权的意识，那时候也根本没有维权的概念。我的看法是，是不是维权，要看行为，而不是看思想认识。固然思想指导行动，但不同的思想也会指导出同样的行动。张艺谋《秋菊打官司》里面的那个农妇秋菊，就是要被打伤的男人找个说法。刘家驹笔下的芦花，只知道丈夫死得太冤，要法院给个公道。她们都没有维权意识，可最后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个人权益。你说，这叫不叫维权？

第三，要结合中国特色来认识维权。中国的特殊制度生出形形色色各具特色的维权。北京香堂村的居民、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用绝食来以保住自己的住房；浙江台州的严正学用行为艺术保护“双雕”；四川的芦花举着斗大的冤字在县委门口为老公喊冤，河南穰县的农民清立受村支书的欺负，拔刀相向。在这类维权行为中，下跪是无告民众常用的方式。兵团人病退困退不算维权，我在拙文里说了，这是最憋屈最屈辱最奇葩的自救式维权。但是，有一点要弄清楚，再憋屈再屈辱再奇葩，恐怕也不能跟孟姜女相比，孟姜女的行为是哭，哭她的命苦，哭她的夫君，即便她真把长城哭倒了，她也只是停留在控诉秦恶政的层面上，距离反抗，还差得远。

第四，张会战认为，兵团领导鼓励战士们病退困退，所以不能叫维权。我要问，领导们负责给他们开病退困退的证明吗？官媒整天讲依法治国，央视每年“三一五”都主张消费者维权，实际情况怎么样？香堂就是鲜活的例子。张会战还说，有些知青不愿意回城，尤其是兵团改制以后，知青自觉自愿地留下。我想说的是，维权并不是万众一心，一致行动，才算是维权，人各有志，邢燕子、董加耕愿意当一辈子农民，你能因此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就好得很吗？

第五，病退困退回城算不算维权，这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不能本本主义（拿百度和维基百科上的词条说事），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标准。毛时代的维权，大多数是暗地里的，偷偷摸摸的，不可告人的，私人的个人性的行动。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公开的、大张旗鼓地，开宗明义的、集体的（云南、新疆式的集体要求回城毕竟是个案）。兵团病退困退式的维权，

跟六十年代农民普遍的瞒产私分和小偷小摸相似。改开后有好多回忆录和文学作品写过这类的事。

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中讲了大量“偷”的故事，“农民，几乎没有不偷盗的”“大家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说破罢了。”莫言在小说《道神嫖》里讲一群在磨坊中干活的农妇，偷偷地把豆子装在裤子里带回家，免于家人饿死。莫伸在《三岔镇风波》里，讲到1963年，尽管恢复了元气，“但是已经饿怕的乡民们想尽一切办法瞒产和拖延。这些外表淳厚的乡民们已经锻炼出一副狡黠的脑筋，不断地变换手法，将粮食埋藏或转移。”沙汀在《木鱼山》中多次讲到“大伙的抵制”，在生产上“钻空子”“弄虚做假”和“做贼娃子活路”。书中还有一个老农说：“那么就是该偷，不偷倒是傻瓜！”

这位老农与安大侠取得了共识——咱们不理亏！

毛时代的体制政策，使偷与骗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救式维权。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维权已经从小说家的笔下来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思想文化学者的著作里。下面的文字来自一篇尚未发表的学术论文——

推行公社化的时候，毛泽东信心满满地说：“共产党的话，过去讲的：抗日、打蒋介石、土改、合作社，都灵了，农民相信。这次提出办公社，农民会很快接受。”（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册，7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经过了饥饿、逃荒、讨饭，断户绝姓，几千万人饿死，以至“人相食”的巨大灾难之后，农民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抵制了人民公社。

当过公社书记、县主管农业的副书记的山西省特级劳模糜则告诉高王凌，本以为在一个前进的事业面前，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以为很快就会改变，并会越变越好。“可是到了大跃进以后，真正的变化开始出现了。”（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8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从1958年开始，农民把对共产党的失望转化成消极抵抗。用中共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的话说则是“避免风险：¹“其办法，一种是在体制内自己采取一些能吃饱肚子的做法，包括社员和干部互相串通的应变办法，即日后我们所说的‘瞒产私分’，这是一种无权者的抵制。一种是扩大自留地，把一小块土地变成自己

¹ 杜润生五六十年代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70年代末80年代初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80年代中期以后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的‘避风港’，避免集体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大试验的风险。”（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农民抵抗的办法五花八门，“瞒产私分”只是之一。因地制宜。在偏远之地，搞分田到户。²在边疆临港的则往外跑。³出工不出力、偷盗粮食、借粮/超支、账外账。这些行为是一种集体的，干部与社员共谋的，党员和贫下中农带头的反抗。原主管农业的老干部杜瑞芝说得好：“私分是秘密的，有的连儿子都不告诉。后来就是假集体，方案都是很好的，一般人调查什么问题也没有。对付共产党，这一类的办法是很多的，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不然的话，活不下去呢，都是掖着脑袋干的。”（高王凌，63页）

“根据各方面资料估计，中国‘隐形经济’的规模大约相当于公开经济的20%，也就是说，大约有20%的经济活动，是处于国家的管理和监控之外的。”

（高王凌，169）”而这20%的“隐形经济”还只是对大饥荒以后的计算，事实上，这种经济早在互助组时期就开始了据1956—1957年的官方报道，“当时瞒产私分的省份已有河北、江苏、安徽、山西、浙江、四川、湖北、贵州、江西、辽宁、黑龙江、陕西、河南、福建、广东、青海等17个省份。”“有偷粮现象存在的省份计有黑龙江、山东、湖北、甘肃、山西、河北、安徽、浙江、四川、江西、辽宁、陕西、青海、广东，共14个省份。”（高王凌，185，187）。

农民想出这些办法，“出发点并非追求发展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维系身家性命，生命安全。扩而大之，就搞包产到户，寻求制度变迁。”（杜润生，83）“事实上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他们一直有着‘反道而行’的‘对应’行为，从而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改变、修正，或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和制度。这种政府与农民的‘互动’，一直贯穿了整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高王凌，192）

这里的农村干部、中共官员和学术人士没有用“维权”这个字眼，而用的是

² 如湖南湘中县“到1961年10月份以前，全县有141个大队1303个生产队实行了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有的干部随波逐流，有的则带头搞。”（高王凌，124）

³ 云南的“思茅两个月时间跑了4万人，孟连、瑞丽两县各跑了一半。为全省最多。1958年那次传闻就跑了10万人。”（高王凌，90）广东农民的“逃港”“主要发生在珠江三角洲，特别是宝安、中山、番禺、东莞和新会等。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总数不下几十万人（当时一县人口平均五六十万）。”“据说约有20%的东莞青年偷渡到香港。”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莞某生产队的两名妇女队长相约数人，驾机帆船外逃。（高王凌，68）

抵制、抵抗、反抗、自我保护、避免风险这类词。这是因为，（1）有些人（农村干部、中共官员）在谈论“反行为”时，还不知道“维权”这个词。（2）“维权”一词在大陆有特殊的政治色彩，一直受到官府的打压，所以，即使知道这个词的学者也避免使用这个词。从语义上讲，抵抗、反抗与维权有本质的区别吗？

第六，龚玉总结的兵团精神是普世的，中外古今都有，尤其是文革的亲历者对这类精神的体会更为深切。从秦城出来的人，不管是老干部，还是王关戚这那样的新贵，都认为自己受到了锻炼，具有了龚玉说的某种精神。被称为“文革前的骄子，文革初的棍子，发配后的弃子，改开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的大学老五届，不管是造反派，还是逍遥派，也都认为自己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磨砺，被誉为有了“担当精神，追求精神，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⁴。总之，龚玉所说的兵团精神并非兵团人所独具。拙文也提到，80后90后的优秀分子同样具备这些品质。他们跟兵团没有一毛钱关系。家长都希望孩子具备这类品质，但没有一个家长会把孩子送到兵团那种环境中去。

“有这碗酒垫底，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一类的表达包含着两种内涵（1）我在兵团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我的精神意志受到了锻炼和磨砺。（2）因此即使今天吃更大的苦，受更多的罪，我也能抗得住。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兵团战士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有多少是来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错误的政策规定。其次，我们是否应该因为“受到了锻炼和磨砺”而肯定，以致讴歌那些苦和罪？讴歌那些苦和罪是否意味着包含着对错误的抹杀，对错误制造者的包庇？进言之，如果错误的政治是非人性反人道的，那么，在这种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兵团精神是否正常，是否健康？“担当、实干、团队、宽容、执着，这是五种最优秀的人格品质，怎么可能是兵团产品！”在这种有力的反诘中，包含的正是上述疑问。

第七，兵团精神与“青春无悔”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果简单地、不加限定地肯定兵团精神，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青春无悔”。我的前面的小文没有严格地限定，这是应该检讨的。其实，我真正肯定的兵团精神是自救式维权。

⁴ 这是北大前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在《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第三卷的序言中说的话。（此书由孙兰芝、张从、奚学瑶和丁广举主编，2015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在我看来，王义遒说北大老五届有“担当精神，追求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尚且靠谱，但是说他们有“独立与自由精神”则脱离了毛时代的大背景，有虚夸之嫌。

青春无悔还是有悔，是中国20后、30后、40后、50后、60后几代人需要共同面对的话题，它沉重而痛苦，艰难而复杂，剪不断，理还乱。记得文革五十周年研究会上，在圣迭哥学院任教的徐贲曾写过一篇文章，对此有过深刻到位的分析——

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如今已经步入老年，这一代人中有许多被文革耽搁了青春、庸庸碌碌地过了一辈子，如今生活处境一般，有的甚至相当贫困。他们并没有理由特别怀念浪费了他们大好青春的文革。但是，他们当中也还是有一些人会把文革记忆成一个信仰纯真、理想高洁的时代，自称“青春无悔”。他们并不是文革余孽，而是文革后遗症的认知失调的不幸受害者。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人信仰越是幻灭，或者越是意识到信仰的荒诞（认知），越是可能会坚持这个信仰（行为或看法），这二者之间是失调的。坚持信仰其实是削弱失调感的一种方式。在社会生活中有一种常见的情形：人为了某个目标作出种种努力，但后来发现结果与原来所期待的相差甚远。面对与期待不一致的结果，有的人不能正确地调整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却坚持原来的看法，甚至变本加厉。这是一种常见的认知失调。

人对某种目标怀着坚定的信念，并为此投入了很多精力，但最终发现那个目标根本没有实现，这会引起很强的失调感。消除这种由于徒劳的努力引起的失调感是很困难的。因为已经付出的努力是不可挽回的，即使改变原来的信念，也无法消除这样的失调感，这时，人只好寻求其他方式，可作的选择是对已有的事实作少许让步。比如说，找些看上去还说得过去的理由为以往事实开脱，或是简单地承认在一些活动中的些许小失误，但总的信念或信仰是正确的。这在文革一代人的往昔回忆和回顾中是常见的。

但是，在对事实作出些许让步的基础上，他们当中有的人会以更加坚定的方式信奉原来的信念，并更加努力地宣传它和维护它，以此缓解自己内心中怀有的失调感。（徐贲《文革后遗症的“双重思想”和“认知失调”》，详见本期书摘）

在20后、30后中，走出“认知失调”的是“两头真”。在40后、50后之中，走出“认知失调”的，是否定文革，反思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人们。

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40后和50后）普遍否定文革，但从反思的深度上讲，中学老三届胜于大学老五届。

第八，官方出于政（业绩）商（旅游）需要，建立的纪念兵团/知青的碑塑馆所。所展览所宣传所讴歌的兵团/知青生活/精神是片面的、歪曲的。它们掩盖了政治的失误，理论的荒谬，屏蔽了兵团生活中非人道、反人性的丑陋和罪恶。这是“红色文化”的规则。中共建政之后，经济上不去，就只好突出政治。政治统帅一切，首先统帅的是人的精神。毛希望用“精神原子弹”建成一个最新最美的世界。后毛时代继承毛的遗志，把“红色文化”当作新型的“精神原子弹”，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声光化电，不舍昼夜地宣传着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遵义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精神、赛罕坝精神……。

为什么有人，尤其是80后、90后、00后会为这些精神所吸引？所感动？因为这里面有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东西。这些东西中就包括龚玉所说的五种兵团精神。为什么有人厌恶这些宣教？尤其是40后、50后中的清醒者（如兵团战士中的刘平清、沈岩真、王金堂等人）因为这些精神中有让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东西。厘清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是中國大陸独立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

第九，要说兵团独有的精神，恐怕还是王金堂说的“袍泽之情”更切实际。而我所理解的“破茧”，是“两头真”式的觉醒，是他们的未竟之业。❏

【思想文化】

关于“兵团精神”的座谈纪要

雷霆 采访/整理

编者按：

2019年12月22日，《记忆》刊发了内蒙古兵团专辑，在读者的反馈中，胡之杨的看法引起了专辑作者们的关注。本刊就此召集部分专辑作者座谈，作者们以不同的视角和认知谈了对胡文的看法。大家认同胡文对“青春无悔”的阐释，而对胡文肯定的五种“兵团精神”（担当、实干、团队、团结、执着），以及他提出的兵团战士们以病退困退为手段，实行自救式维权的说法多有异议。有人认

为自救式维权的说法，是自我拔高，是美化，夸张；是对历史的粉饰和现实的迎合。有人认为，如果说有“兵团精神”的话，那就是兵团战士之间的那种“袍泽之情”。

本刊请大家投票，在83张来票中，对五种“兵团精神”完全赞同的有56人，占67%；部分赞同的（大部分选择实干精神）有22人，占26%；认为不存在“兵团精神”的有5人，占7%。

现将大家的看法整理刊发，希望能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主持人：

各位作者好！胡之杨先生的文章大家都看过了。胡先生对“兵团精神”的理解，特别是关于知青大返城是否属于自救维权以及这种行为和“兵团精神”的关系，提出了一个观察分析问题的新视角，今天我们主要围绕这个议题交流探讨。

秦应雷：

“兵团精神”应该是：自觉不自愿、困境中顽强拼搏，自强自立，为时代担当！大返城是自我救赎维权的成果！

强压下的兵团人，在时机成熟时，肯定会反弹，寻求自我解放，追求救赎之路，与强弩之末的上山下乡运动碰撞之下，各自不择手段取得回城通行证，是一种勇于拼搏敢于智斗的精神，应属于“兵团精神”之一。

这一点可能也是插队知青和兵团知青在一定的层面上的区别差异，即是那种团结、共同面对掌握百姓命运的权力之手如何智斗的精神。如云南兵团知青泣血洒泪抗争上访，迫使中央派出以赵凡为首的调查工作组赴云南边陲了解调研，才得以突破，使千百万知青回城成为现实，得以命运的解脱变更。当时天时、地利有了，人和靠的是拼搏精神！

醒：

大返城是人性的回归。“造假”返城没有罪！个人主义基因对抗集体主义基因的一次胜利。一个谎言环境什么是真的？人性！

沈岩真：

我觉得八仙过海为返城，是很有气势的抗争，终于突破集体主义樊笼的造反，尽管短暂。

张会战：

“兵团精神”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磨炼出来的一种有进步意义的人格素质。这与在兵团改制后仍然留在农场的知青群体通过办理病退这个唯一的回城办法，去搞到有病的证明来办理病退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所谓的“兵团精神”甚至有争议，而我们劳动过的农场今天还在提倡发扬用“兵团精神建设边疆”。

上山下乡与群体回城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前者是在文革当中（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理想主义时期。后者是发生在周、朱、毛相继离世，“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纠错纠偏的初期。当时还是“两个凡是”的大背景（这是历史的必然过渡），病退这个方式是这个阶段不得已（也是唯一）的办法。如果没有上面所说的大背景，谈不上什么个人维权救赎。

北京市在1977年初就放宽对病退申请的审批，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疾病证明只是一个形式。全国知青的病退回城除了云南农场知青（也是个别单位）有一些集体抗议活动。东北，内蒙以及其他地区广大的知青自1977年以后的病退回城都相对顺利，没听说有发生大规模激烈的抗议活动。

可以说“兵团精神”是那个荒谬的糟糕的时代仅存的硕果。是兵团战友们回城后面对生活，工作等一系列巨大压力仍能够坚强，无畏，勇敢进取的人格底蕴。我们赞美曼德拉也不是赞美监狱。

施和平：

造假病退是没有路子知青唯一可自救的出路，但谈不上“兵团精神”。没有什么“青春无悔”，想不悔你能去哪？也谈不上有什么“兵团精神”。

沈岩真：

如果有正能量的“兵团精神”，那么大返城造假逃离兵团就无法解释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这本身存在矛盾。

精神应该是普世的。但是它要崇高，要得到广为认同，要对人类文明进步有引导的意义。因而，什么大寨精神雷锋精神等等都是极左产物，偏狭牵强。而造出“兵团精神”就是极左流毒的产物。

雷霆：

造假回京是知青被迫选择的自救之路，对这段历史，我往往是以悲愤的心情来回忆，以“逼良为娼”来定义。在我的下意识里，造假是不应该的，是无奈之

举。而胡先生的思考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造假回城，逃离兵团我们理亏吗？我们不理亏，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谴责理亏的那一方。谁理亏？当初让学校停课把我们送到农村的人理亏。造假只是一种反抗的手段，不能用简单的道德评判来界定。

沈岩真：

至于内疚自责是错觉，真实的感受是害怕，造假后害怕败露，那是要承担责任的。由于社会氛围没有太大改变，导致这种害怕后来变异成了心虚不硬气。

雷霆：

回看大返城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大家都知道在造假，但从没有人举报过，而是互相帮忙互相掩护，俨然是命运共同体。

另外我觉得大返城得以实现还有一个原因，下乡开始时很多高干还在牛棚。他们的子女也下乡了，后期干部一批批解放，他们的孩子也一批批离开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谎言不攻自破了。这也迫使高层松动了知青政策。

沈岩真：

肯定有干部的原因，地方干部包括高干对子女下乡这件事是有抵触的，相反军队干部的孩子大都参军了，他们就没有这方面的诉求，某些军队高层甚至坚持不许知青返城。幸运的是后来掌权的领导的孩子当时也下乡了，他们对知青下乡的利害有了切身体会，包括后来的恢复高考都与他们孩子的状况有关，领导人接地气了。

高干为孩子离开农村走后门搞腐败，引起知青的气愤和醒悟，是残酷的现实。然而我看到了另一面，就是老干部对所谓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那套说辞根本不买账，他们的关系网对战友是开放的，为孩子开后门齐心协力得很。可见他们完全具备常识判断，对所谓阶级斗争反对修正主义等，并不当真。中毒最深的反而是狂热大众。

主持人：

对兵团的五种精神即为国分忧的担当精神，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有组织纪律的团队精神；互相关心的团结精神，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大家怎么看？

舒顺林：

说实话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一是觉得命题大，非本人能力水平之所及，

自以为说不清、道不明，也提炼不准。退一万步讲，即便能自圆其说，又有谁能认可？会接受？二是我认为当年定义它就没必要无意义，现在拿来探讨它，归结它，更是无用功。

至于有人在讲话或文章中顺便提提它，或是在博物馆、纪念馆里概括引用一下它，倒也无厚非，各抒己见、一家之言嘛。

沈岩真：

所谓“兵团精神”，自爱自吹罢了。

对那段经历不要拔高，只是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在那里生活艰难跋涉，留下难忘的人生印迹，铸成了人生观的某些部位，至今滋养着某种程度的精神生活，如此而已。拔高了就显得夜郎自大。

张会战：

2019年是下乡50周年，我们回到农场，那里的人们扭着大秧歌敲锣打鼓放鞭炮来欢迎我们，说实话大家一下车眼泪都流下来了，很感动，大标语写着：发扬“兵团精神”建设好农场。当时让我讲话，我想到我们兵团组建的背景，以及管理上生产生活上的特点，我提出几点“兵团精神”，也是对农场欢迎我们的回应吧。

首先说担当，为国分忧，担当什么？因为我们当时到兵团去，主要目标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屯垦戍边寓兵于农。和插队知青不同的是，我们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兵团也没有贫下中农，我们主要不是去接受再教育。当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69年是要备战，我们是要打仗。而中苏边境是一片开阔平地，没有任何险阻，如果打起来，苏修的坦克很快就能开过来。唯一屏障就是阴山山脉。当时指导员也讲了，打起仗来我们要往阴山山脉上送炮弹，抬担架等等吧，这就是要有献身的精神。就是说我们来这儿不是接受再教育，是来保卫边疆来了，随时要有献出生命的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谈，我们和下乡知青有不同点，我们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是主要任务，还要有牺牲精神。是有一个为国分忧的担当精神。

第二个就是要建设边疆，我们的劳动是很辛苦的。这个劳苦大家都经历了，无须多说。挖渠割麦脱坯插秧等等都非常辛苦，这种艰苦锻炼了我们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

团队精神和团结精神放在一起说，兵团的主体都是中学生，是年轻人，岁数

大点儿的无非就是几个数得过来的老职工，还有为数不多的复员老兵，绝大多数都是学生，69届的最小，还有老高中生稍微大点。由于来的往往都是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学校，同一个街道的。互相都觉得是个依靠。都是远离家乡，有了团结的基础，加上兵团的半军事化管理，慢慢地，这种团队和团结精神就形成了。

关于执着精神，这不是指扎根边疆的执着，而主要表现在学习上，在逆境中不颓废不放弃。当然也有人彷徨，想回家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主流上都是在学习，学习本领学习知识。晚上点着油灯看书学习。

根据以上特点概括了五种“兵团精神”，这是不同于其他知青，特有的一种“兵团精神”。这五种精神对于我们日后回城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是一种人格的完善。

这也是我们值得聊以自慰的东西，我们有这么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在兵团这种环境下磨炼出来的，逼出来的，或者说锻炼出来也好，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具备了这种精神。包括这个战友之间的互相爱护也是很典型，一连有一个战友慈善基金会，谁得了病可以去用这个基金会的钱。虽然可能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是让这个得病的战友感到很温暖。记得刚回城的80年代初，我给战友家庭主持过婚礼，参加的大部分是兵团战友。碰到不幸的事也一样，我本人就操持了几次葬礼。现在开始有的战友离去了，葬礼也多了，参加葬礼的还是兵团战友为最多。几十年了，大家不散。这也是特有的一种现象。总而言之，我们虽然从那个荒谬的、糟糕的时代过来，我们唯一值得纪念的东西就是磨炼了一种精神。怀念或者歌颂赞美这种精神，而不是歌颂那个时代。

后期回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办病退。这个跟“兵团精神”是两回事儿，那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文革结束，标志就是毛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抓。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新开始的时代还不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最初还是“两个凡是”，这也是很正常的，必然有一个历史的过渡。实际上，各级干部及各级政府负责人心里都明白文革结束了。对于上山下乡这种事情应该重新看待，重新安排。高层也承认三个不高兴：家长不高兴，当地的不高兴，知青不高兴。这个是错误的，要纠正。但是又没有达到公开来推翻上山下乡运动的程度。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做。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各级政府也心照不宣，包括知青办办手续的人也是心照不宣，对知青病退手续都是形式上，过关就盖章签字就办了。有了这个大背景才可能大规模

的人成批地回去，如果把这种情况说成是个人的维权自赎，我觉得有点美化，夸张了，没到那种程度。那会也不懂维权这个词。

改革开放几十年以后，我们已经接受了很多西方的观念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我们的价值观都在变。我们用这些东西去评价过去如何不对，我觉得不太符合实际，也比较牵强。那个时候大家能顺利地回城主要就是时代的变化。而不是靠个人的救赎维权。试想如果文革没结束，毛没去世，“四人帮”再次得逞，知青返城是不可能的。

龚玉：

关于张会战对“兵团精神”的概括，是我在《乌加河之殇》“跋”中引入的。现在细想，说是对知青一代“品质”的概括似更准确一点。当时引用的氛围，就是前面舒顺林所讲“至于有人在讲话或文章中顺便提提它，或是在博物馆、纪念馆里概括引用一下它，倒也无可厚非，各抒己见、一家之言嘛！”只是在后续与会战的讨论中，他认为这只是内蒙古兵团知青才特有具备的，我觉得讲的有点小了。而胡之杨文章，我觉得他也没有错读我在此处引用这些字的含义。

当初引用时，就感觉会与“青春有否悔”挂钩。也是现在再细想，觉得“有无悔”只是一个口号或标识，实质反映的是对文革，以及一直以来的愚民忽悠有无反思和认识。

我感觉有三类人：一是反思派，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and 认识。二是顺从派，一直以来的教育，习惯了上面说什么就跟随拥戴什么。三是回避派，一辈子折腾的累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争了（想，争也无用。而下乡的岁月，对有些人是一生的最高光，对有些人是一生的最晦暗），总之都不愿再深究，就过好眼前的日子吧。

这个争论的最后结果，我想后代人一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能做的，就是真实地写出我们的亲历，以供后人能有个正确的判断，而不要被伪史所蒙蔽和改写。

“内蒙古兵团各自为战回城的方式，是自救式维权…”这个角度，从未想过，但开启了一扇窗，需先慢慢消化。

蔡连生：

我认为没有共同的“兵团精神”，只有命运共同体的抗争。在当时的大背景

下，兵团战士们被压制到了一个卑微的层面，在恶劣的生存条件反射下产生了共鸣和共情。

王蒙有一篇文章，还写过长篇小说，描述他在新疆的生活。说他是到了新疆才更清晰的认识了革命的本质。

我在兵团大田班里干了6年多，在连里也是属于被整过，受过处分的落后分子。我在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怎么样翻身，改变命运。王蒙写的是被发配者的心态，我感同身受。

在1975年末，我办病退，感觉没有什么负罪感。尽管是假事真办，接触到的人都是默认为正常。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已经形成共识：知青是受害者。如果兵团卡住用病退手续回城，知青们也会在其他的方向冲出缺口来。例如：转插，困退等等。

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条件去当兵和保送上学。但是在农村有老家的很普遍，当时有的农村已经开始接收转插了，然后再转送工厂或病，困退回到城里。所以，病退这件事，就是水到渠成，是兵团战士们对命运的一种抗争，一种求生之路，一种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行动。当时兵团战士们精神实质是：抗争！是对前途无望，生存艰难的困境进行的反抗！

如果有“兵团精神”，那就是：不屈不挠的奋斗抗争精神！

醒：

掌握更多相关信息距离真相最近。当相关信息成为桎梏时，伪相就代替了真相，大多数人信以为真还为此感恩戴德。不得不佩服洗功了得！

王金堂：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多年来讨论的老问题了，实质上反思和评价那个运动，给知青一代做历史定位，包括参与讨论的人对自己的人生的认知，是敏感话题，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能引起思想和感情冲突的话题。我的简单看法如下：

一、我们现在的认知和看法，实际上是后兵团时代几十年反思和思想积累的反映，这些认知和看法能说服自己就不错了，不要指望说服别人。

二、这些认知和看法首先能诚实、真实的表达，进而能一步步升华：摆脱对利益集团的恐惧与谄媚、摆脱乌托邦的迷思、摆脱意识形态桎梏的偏颇，进而达到人性的高度，不容易，能够有如此升华的人很少。

三、如果说内蒙古兵团知青与其他知青群体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有什么“兵团精神”，我认为就是兵团战士之间那种“袍泽之情”。兵团是准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组织，虽然没有一起上战场（谢天谢地，幸亏中共和苏共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否则内蒙古兵团知青的命运不可想象），但是一起受过苦受过罪。69届去兵团时，岁数小的才14岁，对所谓“屯垦戍边”知之不详。老三届对秦汉时代的“屯垦戍边”有较多的了解。知道是不可能再回到故乡，或死在与异族拼杀的战场上，或留在边陲垦荒延及子孙后代。在当时，本人一想到此，是挥之不去的深入骨髓的悲哀。诗经上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无衣》，“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击鼓》，不管后人如何引申为爱情，毫无疑问的是颂扬战士之间的袍泽之谊。我们在兵团的时间少则二三年，多则八九年，青春少年时，又是大漠孤烟、黄沙漫漫、酷暑严寒的恶劣环境，朝夕相处建立的关系让人难忘。所以内蒙古兵团知青之间相对别的知青群体有更多的包容、悲悯、念旧的情绪，有更多一点凝聚力。这种袍泽之情，你说是“兵团精神”也是可以的吧。至于说有N条“兵团精神”，还有本人说过的，在历史的天空中有一座永不磨灭的内蒙古兵团知青星座，等等，只是自我感觉，不可当真。

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宿命。每一代人的青春岁月都是值得珍视的。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知青一代与他们的前辈，比如民国一代和他们的后代，比如80、90代相比，其实是最无知识的一代。加之，主要受西方传入的（当然也有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极权主义的恶意、系统的毒害，造成思想和人格的分裂状态远超前辈和后代。本人悲观，我们看不到这代人自我救赎的那一天，直到这代人走进历史的深处才完事大吉。所以，我一般不愿参与这样的讨论，只愿留下信史和实录，作为文化资源，任后人使用和评说。在我们这个圈里，还可以平心静气说说，换个地方，一眼望不到头的网评员、乌合之众、平庸之恶在等着喷你。

刘平清：

那年，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从各自生活成长的城镇，奔赴僻壤乡村塞外边疆。我们来到内蒙古黄河故道，种地垦荒戍边。弹指间五十二年过去了。身为其中一员，静思回首，感慨万千。说说我的看法：

一、关于“青春无悔”。直言不讳，我特别不喜欢把当年的下乡经历与这四

个字联系起来。先咬文嚼字一下。“无悔”者，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有选择，就是有两种以上不同事物供你选择。有了选择的前提，才产生第二层意思，就是悔与不悔。无悔表示不改初心，不屈不挠不回头。当年我在十六岁花季中断学业，远离父母，到大漠荒原中脸朝黄土背朝天，汗泪浸枕眠。我有没有其他路可选？我可以不中断学业吗？我可以不远离父母吗？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是当时没顶浊浪裹挟而下的无路可走！所以我坚决不承认什么“青春无悔”！

二、关于“兵团精神”。兵团时期，仍然是文革轰轰烈烈进行时。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政治挂帅思想第一等等仍然盛行。在我们兵团战士的思想教育、生产生活中充斥着极左思想，只能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屁话。人人头上都戴着“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紧箍咒。不许任何人和事物有个性冒尖。繁重超强的体力劳动透支摧残我们的身体健康，歪理邪说更是毒化扭曲我们的思想。累了不敢说累，病痛不敢喊疼，干不动了爬也要爬到地头！女孩子生理期照样蹚冰水，我这样体重不足百斤的照样抡26磅大铁锤！怎么办？！不干吗？！大帽子批判会吐沫星子谁不怕？！

有人说兵团磨砺了意志，锻炼了能力。兵团人的担当、实干、团队、宽容、执着“五种精神”，由此产生。歇歇吧！

担当、实干、团队、宽容、执着，这是五种最优秀的人格品质，怎么可能是兵团产品！兵团生活的千般苦，逼得我们更坚韧，因为要活下去。兵团时期毒化的精神枷锁，让我们更懂得教给我们的孩子独立思考。怀念兵团时期的一些东西，是怀念我们自己的一去不复返的青葱岁月，和所谓的“兵团精神”毫无关系。

杨仲琪（读者）：

从上山下乡的始发就是带有政治的欺骗，识字的去接受不识字的教育，这本身就很荒唐！建设边疆更是不切实际，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是什么状态？工业尚不发达，是在努力发展工业化阶段。反而让有点知识的人到农村种地。当时的农村是需要人还是需要机械化？不让年轻人继续读书学知识，然后用所学知识去发展中国的工业，用机械化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而是让十几岁的学生停课闹革命，在未成年的情况下赶他们下乡接受不识字人的再教育，这样违背科学颠倒是非。是不可能产生所谓正能量的兵团精神的。

大漠秋风：

我仔细看了大家的发言，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兵团有精神吗？如果有，是什么？最后，我认为兵团没有精神！我们当时去兵团是无奈，不走不行，在那里拼命干，是无知，最后逃离，无所不用其极，是无畏，什么都豁出去了。这个运动，本身就是倒行逆施，不管承认不承认，历史都会这么评价。给一个错误的运动，贴上一个美丽的标签，有意义吗！如果给一个团体概括一种精神，必须能代表大部分人的特点，不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我不知道谁能给出精准的定义！

我同意兵团与插队的区别。兵团的定位就那八个字：屯垦戍边，寓兵于农。如果了解历史的话，应该知道，当年傅作义用黄河能挡住几万日本鬼子，但是，黄河绝对挡不住 T62 坦克。幸亏苍天有眼，否则你我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难道不残酷吗！

你们没看到过，八十年代，在内蒙农委大院，几百个衣衫褴褛的知青，大人哭孩子叫的场面，他们只是要求有个工作养家糊口，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从北京上海去的知青，他们的“兵团精神”在哪儿？

文革把经济搞得一团糟，根本就不可能安排学生就业，最后想出这么一招，让学生去农村。所谓接受再教育，绝对是骗人的鬼话，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真打起来，可以让我们顶一下，其用心不能明说，自己体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举两得，学生不在城里闹了，送到农村还能解决生活问题。打仗还能帮个忙！

秦应雷：

也许就是炮灰了。想到当年领袖在苏联讲的：中国人死三分之二没关系，还有三分之一，几年就能发展到原来的数量，早打原子弹战，打出个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来！知青算什么？还不是为了要当世界领袖牺牲的普通人吗？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所以那个大有作为运动，纯粹是政治需要的忽悠而已！

雷霆：

我觉得兵团生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是现役军人撤走之前，我们脑子里被灌注的是“很有必要、大有作为”等等。包括“为国分忧，屯垦戍边”，这些东西像一个光环悬在空中，成为我们证明自己远赴边疆的价值依据。知青们最初的信念是真诚的。为此有了在艰苦中坚持的动力，信念动摇是从干部子弟走

后门离开兵团开始的。既然是革命的道路为什么干部子弟可以开小差溜走，老百姓的孩子就得在这儿受苦？光环开始暗淡，信念发生动摇。随着现役军人撤走，知青成了农场职工，就有了被抛弃的感觉。原来我们走的所谓革命道路并没有那么伟大的意义，就是当了农工而已。看来知青下乡是革命干部都不买账的事，那老百姓再坚持不就是犯傻了吗？这个最基本的认知成为造假病退的动力。而“四人帮”倒台又是一个契机，上面的政策松动了，仿佛堤坝裂了一个口子，汹涌的潮水一泄而出，大返城势不可挡。这里面虽然有时代变迁的因素，但是人心向背不是政策决定的。下乡时反复动员，威迫利诱政治高压，知青们不得不去。而返城的机会来了时，并没有官方的号召动员，没有最高指示把返城作为革命行动，相反是还设了很多条条框框，然而大家都自觉自愿地造假返城。没有一点强迫诱惑在内。

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前期的虔诚和后期的溃逃，这种反差如何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和统一？似乎很难。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是美好的，造假是不堪的。我在序言里说：大返城是知青的心中之痛，背后的认知就是把造假病退看成是不得不做的不堪之事。然而，胡文以及大家讨论给我一个新的启发。是非道德要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评判。我们前期的虔诚是建立在对人权的无知，对政治的无知，是被洗脑的愚忠，是无价值无意义的。而我们后期的自觉自愿地造假返城，正是人性本真的苏醒，是追求公平追求生存权的抗争。

就精神而言一般来讲应该是有普世价值的，比如基督精神，主张的就是爱，宽恕，敬畏造物主。这是有普世意义的。我们讨论“兵团精神”，也是试图通过我们的实践提炼出一种在人生逆境中如何获得力量奋力前行的精神元素。这个确实太难了，首先我们是被放在一个错误的事件中，其次是我们的“造假”维权也没有普遍意义。但是，不能否认我们被一种类似精神的情结连接着。至今，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兵团战友，我和战友们下乡几年结下的友谊和感情，远远大过一起工作30多年的同事。我甚至觉得我能有如此厚重的知青友情，是我人生一大幸事。所有青春的付出留下最可宝贵的结果大约就仅是这点吧。正如九原在第三条里谈到的，这是兵团特有的一点精神财富。

会战总结的“兵团精神”，如果放到各个连去征求意见，我觉得肯定会获得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赞同。这也是现状。我多次说过知青何时能有“破茧”之

旅，从走进内蒙古到返城，从下岗到重新就业，我们一次次冲破命运之茧，知青的不屈和执着是可敬的。但是，我们在思想上在观念上，在对历史的认知上，在推动社会变革中，是否也应该开启“破茧”的思考和行动。这一点，九原是持悲观的态度。不过从这次我们讨论的情况看，战友们坦诚交流，互相启发，我们的“破茧”之旅在路上。

优优（读者）：

本人在“913”前就疑窦重重，“913”起彻底醒悟了，后在80年代抱有无限憧憬，现已基本破灭了。

放眼周围同龄人，多数或静好型，或歌德型，与他们的经历完全相悖，相扭曲，这些人并非无启蒙，只是他们不是被现代文明启蒙的，而是年幼时被反人性的蒙昧思想启蒙的，成年后没有清垢纳新，造成至今的整体愚民，出现民间严重的撕裂。也正是高层制造的，追求的，单单偶像崇拜就足够用了。我认为“破茧”很难，群体“破茧”至少短期无望，个体“破茧”概率就更小了，我估计大概率是无法设计、无法预测的偶然性事件，黑天鹅降临。思想樊篱和现代人类文明绝非一朝一夕打破和建立的，我辈很难亲历了。

雷霆：

人格分裂是人性的本真被压制被摧残的必然产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价值评价体系违背人性时，人的表现就出现了两面性。可怕的是有的人竟无意识地穿梭于两个体系中，津津乐道地表现自己的虚伪。例如极力粉饰知青运动的人，他们中有一个情愿回到农村重做知青吗？我敢说一个也没有。

张会战：

说实话我作为69届初中生，到兵团时刚满16岁，真的不懂什么。要说开始思考就是“913”事件，是一个巨大震动。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才真的学习、看书。之后不久连队里就开始出现有高干背景的战友调离（没有任何理由）。这两件事的发生使我迅速成熟（成熟是伴随着失望同步前进）。我曾在日记中写过，那些高级将领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钢铁部下吗？怎么他们带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73年开始的工农兵上大学又给连队知青们燃起希望的火焰，学习的氛围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74年我曾有幸作为有特出才艺代表（15团共3人）前往师部接受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招生面试。结果3人全没戏，后得知人家招生

是早有预案，我们仨不过是去走过场。（那个被招生的是 XX 军区宣传部主任的儿子）。更为打击的是 75 年最后一次上学机会我已被连队推荐到团部，本以为这次是铁定的。但到通知下来后又没有我，事后经在团部工作的战友透露是被一个在团部工作的 XX 地知青顶替了。成熟就是这样开始的。思考也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主持人：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主要观点是针对胡先生提出的“知青大规模造假返城本质是一种自我救赎的维权行为”提出异议，文章的观点主要是认为知青大返城仅以脱离农村恢复自己的城市户口为目标；包括云南知青下跪喊出我们要回家，还是乞求的姿态。大返城运动只在生存层面展开，不具备人权意识法律意识维权的要素等。此文各位也都读过，大家有什么看法？

沈岩真：

认为知青造假返城而不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太了解历史，文革砸烂公检法，到知青返城时公检法尚未恢复正常，哪有可依据的法律存在。而且那是一个下跪都会获罪的年代，所以云南知青所表现的是一种抗争精神。

雷霆：

对知青大返城的维权行为做降格的评论，我不太同意。文革刚刚结束，知青们以不可阻挡之势返城，是一种不再听凭命运摆布的抗争。也是从对“一句顶一万句”的盲目崇拜到自我意识的苏醒。拿知青和农民比，认为知青没有和农民平等的意识，这个说法也不够全面。知青是特定的历史产物，农民是中国几千年的存在，这中间不存在比较和等级。城乡差别的存在，不是知青造成的，更不是知青可以改变的。消灭城乡差别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然产物。当然农民也需要维权，需要被启蒙。在这一点上知青和农民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是共同的，是平行的关系。

王金堂：

云南兵团知青的抗争是一次大规模有组织有策略的“预谋”，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成功的抗争，主要组织者是四川和上海的普通家庭出身的知青，时间是知青大返城的后期（1978 年，北京天津的知青差不多都已回城），抗争的对象主要是某些阻止知青返城的高层领导之流。同时也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控诉和反抗。

把云南知青泣血反抗评价为下跪乞求的看法，不仅是偏激，更是无知，是自认思想深刻站在道德高度的自以为是。全国来说，进行抗争的也不止云南一处，在内蒙古当时就有呼和浩特包头二市的知青上街游行。

龚玉：

该文对云南兵团返城请愿的评论，我认为过于偏激和片面了。初读本刊289期上20团9连故事，震撼。但这么坚决坚持的抗争，其实仍是工作组长的一句话：“等着，我们会回来的”。而真等不到了，也就作鸟兽散。去15团或病退转插，也是随了或回避（逃了）。那样一个红色政治之下，张志新、遇罗克只是顶尖之少数，大众永远做不到。即使下跪乞求是最卑微的方式，那也是抗争，而且为全国知青争得达到了最终的目的。其实他们的抗争还有集体的绝食，这种方式不惨烈决绝吗？如果问题一直不能解决，应该也会有人最终奉上生命的吧！

本刊288期《绝食》一文反响很大，也是因抗争方式的巨大反差。其实无论是绝食还是后来的极左，二者都是为求生存而已。当20团战友来到15团后，强烈感受到兵团战士“不自觉的人格分裂”，我是赞同的。而且觉得这种人格分裂至今仍在中国大地处处飘荡，且越演越烈！

雷霆：

此次讨论，我曾私下和个别战友交换过意见，他们的观点我也在此简单叙述一下：

1. 对“兵团精神”肯定的说法显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思路，这是视野问题，还有我们所受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一贯是这样教育下来的。个人觉得所谓“兵团精神”是不存在的，赫塔说过：“文明社会对个性的培养，从个体出发去理解自身及周围的事物，在这里不存在。这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柔软性格的培养要在皮肤还稚嫩的时候开始。将来要想克服自己的柔软，唯一的办法就是巴结权势、否定自我、委曲求全，唯其如此才会有机会。”（《国王鞠躬国王杀人》12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段话讲的道理是，我们没有学会从自身的感受来理解周围的世界，我们总是委屈自己，总要附着在一种大腔调当中。这段话对我们的认识论有指导意义。

2. 三北兵团包括西北新疆、华北内蒙古、东北黑龙江。有半军事化的性质。如中苏继续交恶，内蒙古兵团也有可能不撤建。如果兵团继续建制，是否有“兵

团精神”存在？恐怕就不能得出全盘否定的结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因为西北民族问题存在有战略意义，所以一直建制至今。自古历代都重视屯戍经营。上山下乡，移民实边，古而有之。都是从国家计。因中美、中苏态势变缓和，国际国内形势允许，绝大部分兵团会撤建。兵团建与撤，要放在大系统中分析。简单认定要惩治一部分人是片面的。看问题要有系统思维评价体系，都要看两面。任何体系，参变量很多，孤立看问题会偏颇。要注意历史的时序结构，时空结构，（时代背景和地域条件）。逻辑结构（因果）。

我们对兵团的认知，都带个人倾向。写实可以，评说留给后人。隔代修史。代代人有自己的看法。

王金堂：

希望我们谋定后动，老骥伏枥，“破茧”而行，在生命觉悟的路上有所成功。



【怀人】

请中共党史界记住她

——由罗星原女士重提罗章龙研究资料

邓伍文

开 篇

罗星原走了，孤零零地走了。



2021年的第一天就听到这噩耗，可她并不是2020年里最后一天走的，三周前12月10号，她就回到外公罗章龙的身边了。

不幸的消息，我转告了她在北京的表弟，也转告了她认识的另一位朋友，再想转告第三位，却还没有联系上。

罗星原太默默无闻了，但一生又大不同于

寻常人。1949年11月1日生于长沙，一生没见过父亲，母亲也不在身边，一直就生长在外公身边。外公把一肚子党史故事全倒给了她，把全部回忆存稿委托她照管出版事宜，手书“不得有误”。2005年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的《罗章龙回忆录》凝结着罗星原的心血。后续的其他渠道的出版事宜，仍在进行中。

中国的历史记载有官修的“正史”，有民间的“野史”，还有超然于两者的“载记”。在中共党史领域里论载记类文献，罗章龙的载记肯定是首屈一指的，而罗章龙载记的每一个字都和罗星原的默默奉献分不开。

愿所有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能记住罗章龙和他的外孙女。

一

今天，又得到有关罗星原女士的消息，她的亲戚罗星瑞女士护送其骨灰回浏阳老家，入土为安了。

这简单的消息，不能不告诉关心她的人。

三天前那则四百余字的短文——《请中共党史界记住她》——牵动了许多人的心。短文刚贴上微信网络，四面八方的哀悼就纷至沓来。人们关心她毕生心血守护的珍贵史料，希望能看到读到，能借以研究党的历史；人们还关心她默默奉献的艰难历程，希望在载入历史的这段镜头中，能留有罗女士的清晰形象。

说实在的，新开年以来，才五天五夜，入夜便因她辗转反侧，清晨醒来依然浮想不绝。在那个大清早，匆匆写下第一段哀悼文字，今晚，又翻开多年前的日记——

是1994年11月的18日，“意外收到”罗星原的第一封来信，先前我并不知道罗章龙有这么一位后人，尽管我“钻罗网”接收罗老资料已近五年，正在进退两难中。随后给罗星原回信，再收复信、通电话，两次往来后，12月22日我便以迫切的心情飞往武汉，当天见到她，“谈至天黑，得材料数份”。拜读那一笔一划写出的清秀文字，逐句逐字消化，三天后便给北京的李锐发去仅仅数字的信函：“近到武昌，得见骇世文字，允日后面谈。罗老最亲的一位后辈问候您。”

自1990年3月起，我第一次和李锐老伯谈到罗章龙，就知道他们早在50年代初就有联系，李锐调离湖南前托人去详细问过新民学会初期的人与事，30年后在北京住同一医院，又多次交谈。我几次去北京，一见到李锐，他都急急地

询问罗章龙研究进展怎样了，甚至动脑筋要调我进北京，就近抓紧，一定要把罗章龙在党内经历的那些事留下来。当时李锐不满八十，罗章龙已年近百岁，李锐担忧老人把“六届四中全会”和“非常委员会”带走了，“过七十的人，活一年是一年；上八十，活一个月是一个月；九十开外，活一天是一天啦！”急迫的话语余音中，又联系起他自己，《庐山会议实录》一出来就特意送罗老一本，就是要让罗老也能留下会议的“现场”。王明搞的四中全会，后人搞的庐山会议，都是让全党吃了大苦头的呀！

时在1994年岁末。当时我准备来年春节之后去北京，当面向李锐谈谈罗星原提供的材料，太惊人了，完全可以推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在我准备离开武汉告别罗星原的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闻‘西变’有关事，真乃惊世之绝唱！”第二天，我登车北上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95年的春节里，罗章龙与世长辞了，享年百岁。我写下百字挽联，其中有“敢问此世间 有几付热肠 贴向椿翁 也仰他潜心凿就名山事业 却饮密藏幽恨”句。不用多说，天赐罗星原一腔热血，就是为罗章龙而热，为罗章龙而洒的。热得其所，洒得其所。

时隔26年，又是岁末，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将多次修订的《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书稿发给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这本书的起源，就是罗星原提供的史料。我只是在李锐老的敦促指导下，核实并记录下关键的史实，勉成书稿时，李锐赐序并题写了书名。书稿在2000年初次付印，凡是应该出现“罗星原”名字时，我都用“罗××”代替。书中有一句冠以“戏曰”可摘录于此：“能否戏曰：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局外’得知消息而静候‘重大新闻’的，天下独罗章龙一人耶？”只因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罗章龙人在开封的河南大学校园内。这句戏言就是源自罗星原初次见面时向我说的大实话。后来，陈铁健老师在书评文章中也原义照引：“能否认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局外’得知消息而静候发动者，天下独罗章龙一人耶？”（书评文载《抗日战争研究》杂志2002年第1期）

写到这里，想起今天白天有网友特转我看李海文的《我所了解的罗章龙》一文，她谈到与罗章龙交往中“值得一记”的一串事，其“之五”是：“罗章龙派黎天才到张学良身边工作，推动西安事变。但是他没有详谈。后来我见到研究西安事变的张魁堂，他也这样说。张魁堂还准备写一本书，可惜因病早逝未能完成。邓伍文2000年以无文为名，写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书中有相

关内容。”（此文载于《湘潮》2015年第2期）张魁堂是全国政协的文史干部，西安事变亲历者刘鼎在政协工作的首席助手，生前写出《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与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李义彬的《震惊世界的一幕》，三家三卷并称研究西安事变的鼎立之著。

李海文的这篇怀念文章，提到了党史研究中的好些大事，都是跟罗章龙接触后，大有收获。其实李海文也有疑惑，我俩曾当面交流过。她向我提出的几点疑问，我都明确回答，其中也有讲明了“不便说”的，我告诉过她，罗章龙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了罗星原，罗星原是在罗章龙身边生活最久、最了解罗章龙的亲人，早就是一肚子党史，自己不能写，还难得有人可以听她倾诉。李锐听说罗章龙那里还有“不便说”的，便一个劲地追问，我只好告诉他，如果您有机会上南京，我会给您看的。

到了1999年的4月间，真有这样的机会。李老应江苏省社联之邀来南京做“五四”八十周年的演讲，我呈他看了罗星原交我的几件珍贵史料，他连连感叹，在党内这么多年，就没听说过呀。当然，就是那几件资料，顿时打消了李锐心中多年的疑惑，豁然理解了藏于罗老心中的难言之隐。连胡耀邦、李锐那么关心，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他有啥说啥，罗老竟然也有守口如瓶的一个大块块。老人心中缄默以终的私密故事，只对星原一人说出，连亲生儿子都蒙在鼓里。李锐敏感于史笔轻重，几年前就关心起罗星原的生活，曾让中组部老干部局出面，向罗星原所在单位打招呼，布置落实，照顾党史老人的后代。

二

看到罗星原骨灰落葬的照片，由微信转出去，心情却跟墓上新覆上的水泥一样，冰冷冰冷的。

差不多就在两年前，星原奇怪地告诉我两件事，一是托亲戚在浏阳老家买了墓地，再是第一次说出她的亲生父亲。迟钝而未加深思，这未曾联想、不愿预感的不祥之兆，终于在不到两年时光里化成现实了。如今看来，这天，这地，寒气是不是太重了些呀。

星原有父而不能见不能谈，到70岁时才能说出一丁点儿，原因就在她外公罗章龙那里。罗章龙早年在浏阳家乡有原配，1917年的春天，新民学会在长沙

湘江边成立，同年冬天，他与夏景云在浏阳河上游桥头村完婚。转过年来，罗章龙离开家乡，初拟东渡日本求学，后又改为北上，考入北京大学，开始了男儿志在四方的生活。1927年初夏，罗夫人景云女士病故，留下一个女儿，名罗梦平。

罗梦平先在家乡上学，罗章龙易名罗仲言进入开封的河南大学后，才被接到父亲身边。1936年，罗章龙与黎天才在青岛秘密会晤，讨论策动东北军兵变的事，把女儿梦平和学生何文带在身边，让何文辅导梦平功课。罗章龙为她俩在青岛栈桥附近的留影，成为重要的史证佐料，我在《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书中选用了两张，从照片上看梦平约二八芳龄，未脱乡间女孩子家的羞涩。

后来，罗梦平一直在父亲身边，开封、鸡公山、武汉、重庆到陕南的汉中，一路同行到城固县，至1939年秋才有安定的家，她一步一步完成学业，1942年毕业于国立第七中学，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当梦平毕业时，罗章龙又转回长沙，进入湖南大学任教。梦平刚找到工作，与同校的一男同学相爱，准备结婚，罗章龙坚决不同意女儿自主终身大事，坚决不让女婿进家门。其中，丈人对女婿政治上的不放心，女婿对共产党的根本不了解，都可能是致命的因素；其实，全校师生谁也不知道罗仲言教授与共产党有过什么瓜葛，不知道这家人还潜伏着什么政治危机。一对青年人倾心热恋着，苦果在国共搏杀中渐渐酿大。终于，共产党打下天下，罗章龙的艰难自保进入漫长的新阶段。五星红旗刚在北京升起一个月，11月1日罗星原降临人间，她的父母也已断绝关系。罗梦平回到湖南，在长沙外围某地的银行里工作，自己的亲骨肉交予父亲与继母抚养，只在难得的探亲假时回父亲家里看看女儿。心情抑郁的梦平，单身独居，退休很早，由女儿办了顶职，本人于1980年因病去世。

罗星原从出生，一直到中学毕业去农村插队，将近二十年里，就在罗章龙的身边。无论是在长沙的湖南大学教授生活区，还是1953年迁到武汉，换成中南财大的教授生活区，从来没有人知道罗星原的父亲是谁。难听的流言，不堪的蜚语，一直悄悄地跟随着这一对祖孙。甚至到了90年代，李锐本人、李锐原先在湖南的很有身份的一位老朋友，分别悄悄地对我讲过这事。对于刚刚沾上“罗章龙研究”的我，能听到这样的“悄悄话”，提醒你留神，可谓惊心动魄，摆在面前的历史人物不仅政治问题悬挂在高压线上，生活品行里也布有“臭巴子地雷”？如果不是我去了开封、西安、汉中、城固，见到罗章龙当年的多位学生，

也就是罗梦平的一帮同学，根本就不会知道罗星原的父亲到底是什么人，也永远不能理解罗星原说过的“我是山东人的后代”，“我们山东人就是爱打抱不平”。

罗章龙年近六十调往武汉，将临退休，构思并落实起人生晚年的“规划”，深感“江城赢得半楼闲”，便“殷勤辞赋课双鬟”（罗章龙作《浣溪沙·烽火》中句，鬟是指女子的发髻）。这“课双鬟”就是在年幼的罗星原身上倾注心血。伴随着外孙女的小学、中学，罗老自己完成了长篇回忆的初稿，开始交后人帮助誊抄。誊抄是用老式复写纸的方法操作，一式四份，前三份基本清楚，第四份就很勉强辨识了。参加誊抄的有罗章龙在新疆工作的长子罗平海、在湖湘工作的侄子罗可成，他俩只能短暂参与帮手，真正的誊抄主力是罗星原，她已是初中生，一手娟秀的硬笔字，就是从那时练就的。

几十万字的长篇，分四十余章，赶在文革爆发前完成。装订成册后，四套分散密存。这期间，罗章龙还指导罗星原学会了地下党“密件”的老法子，用糯米汁书写、碘酒显现，藏于鲁迅等书籍中的天头地脚、横竖行间。还把重要的资料用相机翻拍，原件销毁，密藏底片。当红色江山下的阶级教育铺天盖地时，罗星原已经被另一种“红色传统”手把手地培训成熟了，青春的心灵开始懂得了自己身负的特殊使命。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肚子里的党史故事也越装越多。

有了这样的周密准备，罗章龙开始跟两位老朋友联系，一是毛泽东，一是董必武。与毛，早年的“二十八画生征友”不说，自1949年8月开始恢复联系，秘密来往滴滴拉拉不断；与董，可以追溯到1927年大革命中心的武汉，罗章龙的父亲罗泰钧与董必武同在湖北为战友，罗章龙则兼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中央工委数职，与董必武早就有生死之谊。今天，可以看到的毛一罗、董一罗之间的联系记录、函件等，全是罗星原保存下来的。

一场文革风暴，罗章龙被一群“金猴”抄家，整套的回忆录连同其他史料遭洗劫。天下大乱中，罗章龙在中共党内的老对手也许会暗中窃喜，真以为他罗某人不可能再“翻身”，再不会有“私写党史回忆”的安稳时日啰，彼此都是七老八十的翁叟了嘛。谁也没有想到，当罗星原把爷爷（她一直这样称呼）从“牛棚”里接回家时，欣慰老人安然无恙，现代版的“义女”缙萦救助长辈的故事得以继续演绎。

随后是“九一三”事件掠过，学历史、调查历史真相的任务总得进行呀，

神州大地忙不迭边边角角的人呀事的，总得找些知情者去讨个说法吧，罗章龙又开始接待全国各地手持“介绍信”的来访者。渐渐地，罗章龙慨然而然“大江流梦到沧瀛”，把另存别处的整套回忆录取回家中，让罗星原再次誊抄。他自己也续写起新的篇章。到文革正式宣告结束，罗章龙在罗星原的帮助下，大致完成了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书屋”意）的“载记”“散记”和“自传”“年表”等全套的回忆文稿，如果加上“诗草”和其他“散稿”，高达百万字上下，字字清晰，份份完备。历史上的司马迁苦苦以求“藏之名山”，两千年后，罗章龙潜心蓄志来了个“史笔遥尊司马迁”；如果说洋洋大观的《史记》终由司马氏家人传承得见天日，运作详情却不见史载，那么罗章龙的回忆文稿，且不论史学价值是否宏远，而帮助其传承并终见天日的，首数罗星原，历史功绩已是毫无疑问的。

当1978年“春天”来临时，由北京党中央交办、湖北省委落实，派党史专业人员上门帮助罗章龙，把亲身经历的党史情况回忆写出来。因罗家中条件不宜，随即移师东湖宾馆，有了中共党史资料征集中著名的“东湖座谈”，连续座谈了十几天。上午由罗章龙做回忆口述，临时抽调来的五六位同志，边听边问边记，下午分头整理记录的做文字整理，准备明天口述的做提纲准备，晚间交罗章龙审核记录稿。按小型座谈会的参与者于吉楠的回忆，罗章龙一再说许多党史文物“被抄走，多年辛劳毁于一旦”。其实罗章龙叫苦的用意，就是要通过组织渠道追查抄家元凶，如果露出口风自家另有留存，谁还肯下力气去真找真追呢。当时，全程陪同罗章龙照顾起居的，就是罗星原，祖孙俩共同演出了一场“苦忆”之戏——一带着整套的“亢斋载记”住在东湖，每天下午晚上，从成熟的回忆稿中摘出若干，第二天上午口述，同时提些关键性要求，示意甘于相助的年轻人继续搜寻资料——如此这般环环相扣，巧妙无痕，尽在罗章龙的老谋深算之中！

毛泽东寄予厚望的“世事纷纭从君理”的压轴大戏，开始了……

三

九十年前的1月11日。在中共党史学界知道并关注这日子的，人数不会很多，甚至微乎其微。而我是四十不惑以后才疑惑陡起，稍不留神，竟一步一步盯上那段日子，盯牢那天在上海郊区有过的一次党内高级别“会议”。

那是1930年冬到1931年春，大事怪事挺多的。鲁迅有过《为了忘却的记

念》，已是历史名篇。可他，为什么迟迟才发声呢？通篇涉“龙华惨案”分明是两年前的事情呀；为什么一夜间二十四名“朋辈成新鬼”，他只写了五位呢？如果不是罗章龙、罗星原隔代接力，后人会永远解不开这个谜，我辈会糊涂一生。幸亏有罗氏祖孙在鲁迅之外再发声，将冬春相交数月里促“新鬼”别“朋辈”的残酷真相记载下来，保存下来，继而抖搂出来，历史真相的一角终被揭示开来。

这就是我在哀悼星原时，最想对中共党史界、对关心中共党史的朋友说出的。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也是让朋友们理解我的哀思，自引自全文照搬未刊的旧稿如下：

为何说这话——略谈“花园会议”

我说过一句怪怪的话：“写党史，若不写花园会议，任何一部中共党史都是半部党史。”乍一听，很不好理解，什么是“花园会议”，闻所未闻，又无从查找。只即便是专业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人，也未必全清楚。

这话显得够狠的。可我，多次说过，而且每次都很认真。因为我反复想过，想得很认真。为何要说呢？就是想引起认真广泛的讨论。

我是1995年底开始那样说的，而思考还要早个四年。当时准备参加“何孟雄思想学术研讨会”，却面临个大疑团：何孟雄等人怎么会被捕的？即著名的“东方饭店事件”是怎么发生的，1931年1月17日前后，一大批人被捕的起因何在？如果按照党史界多年的说法，最为蹊跷的“告密说”，完全不能认作是隐名告密者的一时冲动，反而只能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出卖，据此解释党内斗争恶化才导致了众人被捕事件……那么，在史实之链上，就必须弄清如何一步步“恶化”的，关键要找准“你死我活”的转折点。

“你”与“我”共处党内已很长时间，就在十天前，即1月7日那天，双方还同聚一室开了个中央全会（即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虽然闹得不欢而散，但也没僵到“死”与“活”的份上。所以我在“何孟雄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提出：那十天当中，必有触发“你死我活”的事端，值得去弄清楚。

逐日排查史实，查来查去，曾有资料提到“花园会议”，它具备了引发党内斗争恶化的可能性。

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注意到有四份资料里出现了“花园会议”。

就发表的时间看，其中三份比较靠近：一为1979年夏天胡华在合肥做的有关党史的专题报告，顺带“吹风”，说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二是同一年里黄玠然发表的《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文章，三是1981年罗章龙发表的《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不到两年时间，有了这三份资料。再隔约十年，90年代初出版的《王明评传》里也有一段话，又一次提到了“花园会议”。综述这四份资料，形成了三“正”一“反”：罗章龙说有此会，他是亲历者；胡华说有此会，他是自40年代起就研究中共党史的资深专家；“评传”也说有，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课题。三家从正面认定，各有其分量。而黄玠然其人，早年出入中共核心圈，1931年初，为中央组织部人员，协助周恩来工作，亲历过许多事，“反”说亦不可轻视。不过，黄玠然没有明确否认该会，只是推说不知道，还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反”说。

1994年春，我在北京见到罗章龙，径直追问“花园会议”，想探明史事细节，未得其正面的明确回答。第二年，老人去世了。后来，我得到他后人提供的罗老有关“花园会议”的回忆，以及他1979年10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信。细读以后我相信，历史上确有“花园会议”，性质相当严重。

看了罗家提供的资料，同时也留意其他当事人的说法。到了1995年年底，脑袋里打转转，冒出“花园会议/半部党史”的想法，斗胆在小圈子里直言，希望多几种声音，共同去弄清史事，便以带刺激性的词语去引人关注。

不妨回头分析一下那四说。从时间上看，胡华的“吹风”明显居先。而胡华又是何时从何处知道花园会议的？也是个大疑难。若源自罗老，又为何会早于罗老数月？若另有所闻，又为何人？因胡华过世多年，此惑似乎成了悬案。后来我请教中央党校的于吉楠教授，他告诉我，是他将罗老“东湖座谈”中的有关内容转告胡华的。事在1978年夏，党史界邀请罗老到武汉东湖，连日做党史专题的谈话，历时一个多月，这次活动被称为“东湖座谈”。座谈会每日有记录整理件，罗老也逐一过目。事后，这批文字从未公开发表，只在党史学界小范围流传。其中，罗章龙谈到了花园会议，这是他在事隔近半世纪后首次对外谈及，但他讲得并不详尽。于吉楠参加了东湖座谈，胡华没有去。于吉楠后来在中央档案馆等处，查阅档案资料时格外留意，却从未见过“花园会议”的相关内容。所以，这

么多年来，于吉楠在自己的文论中，从来不提花园会议，但也没有“反”论过。

以于吉楠的学术地位和功力，不轻易认同罗老之说，值得赞许；反之，以胡华治史多年的学识功力，那么快捷而笃定地认同了，反倒令人费思。胡华的性格外露，在于吉楠相告之前，若已有所听闻，他一般不会缄口不说。他也确实没有向于吉楠表示自己早有听闻之类的话；他在1979年以前，也没有更早地向外“吹风”；合肥那次“吹风”，也没有“花园会议”的更多内容。所以，可以大致认定，胡华之说，仅仅是大胆地认同了罗章龙之说。还可以推测，黄玠然的表态，大约也是在东湖座谈、胡华吹风以后，有人感觉此事体大，找到黄玠然核实，他出言谨慎而已。

这样一来，问题又回到了罗章龙那里，是他引起了“花园会议”的历史话题，沉重不堪，若缺乏有力的旁证，终属待核查之史事，或归入“孤说”不取之列。

转机出现在1999年7月。我见到“陈郁自传”（原名《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的思想总结》）的副本。陈郁亲历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一开始就站在反对派一边，而且他还经历了紧接着的两项重要活动——花园会议和中央非常委员会的酝酿成立会。陈郁后来的态度有所改变，侥幸保住了性命。他的这份“自传”，写于1943年，首次公开发表是他去世后多年，刊于80年代初《广东文史资料》的第一期，有关他所参与党内斗争的部分被大大删减，拿掉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好心”的编者隐去了有关花园会议和非委成立的内容。这等重要的史事被掐掉，不知为何不让人了解与研究！来，陈郁写自传时身处延安，下笔时没有什么框框，敢于说实话，不乏讲几句罗章龙的好话，完全是在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尽管陈郁所讲的“花园会议”和“非委成立”两事，在措辞上与罗章龙所述略有差异，名称不一，记述的事件过程稍显单薄，但在基本事实上是完全衔接的，是可以解读、可以相互认定的。也就是说，早有陈郁的文字存世，罗章龙关于花园会议之说不孤。

说完史事的真实与否，史实的价值自然就凸显出来了。

单从史料价值上比较，“陈郁自传”好似“黎天才自传”。两份自传均写于20世纪的40年代，都是在同罗章龙分散多年，天各一方时写下的，其中都有着可以印证罗章龙晚年回忆不虚的关键内容。他俩有意无意中所说出的关键点，

恰好点明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事件的“始”和“末”：其始，迫于党内斗争跌入异常，突呈残酷；其末，结束于继续为民族为中共为红军挽危亡，即策动东北军1936年末的兵变。后一件事，笔者向史学界披露已多年，尚未见“反”论，已渐为海内外专家所注视，甚至被誉为西安事变史学界的一家之说。那么，前一件事呢，一旦披露出来，党内外治近代史的专家终不会视而不见的。

我一再放胆而言，就是建立在对史料的充分确认上。“花园会议/半部党史”或许会有更多的牵动。回顾一下，一部延安时期的“历史问题决议”，当时争论最凶的，莫过于六届四中全会那一段。既然花园会议一字不着，那还叫谈了要害吗？可能当时的高层核心无奈于重不得轻不得，反反复复斟酌出个“大决议”；时隔三十多年，又来个“大决议”，还搞上上下下的大讨论，依然不曾触动史事的关键，只是换了个人拍板“说了算”。关键在于，当事人的申诉材料早已递向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会，难道最终还需依靠其他力量，另辟蹊径，去给历史一个明确的说法吗？

所以，这里还须留意的，2001年有一桩，在纪念龙华烈士殉难70周年时，上海龙华纪念馆研究室组稿汇编的文集中，有一篇论文约有二百余字谈到了花园会议，简要地认为有此会，并论及“严峻的党内斗争形势”。此文已编入龙华烈士纪念馆编《烈士与纪念馆研究》第五辑中，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这可是党内的健康力量呀。乐观地看，这或许是个征兆，预示着实事求是地重论“非委”事件，“摆事实”能够展开，“讲道理”得出公论，也就不远了。

中共党史上六届四中全会及紧随其后的花园会议，作为历史节点能否绕过去，决定了党对自身的认识程度，搞一本糊涂账、半糊涂账，还是一本明账，都有可能，就看党史界是否想弄清、说清它了。

上文此番自引之前，曾呈多位学者专家过目，很想听到却从没有收到反驳或异议。今后，如果在“花园会议”这个节点上中共党史界能有新的研索，能记住罗氏三代的名字，私心聊慰的同时，感觉还有两位专家也是不能不记住的，他们是于吉楠和李海文。

追溯这哀悼续篇里分别提到的两位，细说来——在“东湖座谈”时罗章龙富有心计，“响鼓不用重槌敲”者独数于吉楠，由他而胡华，使得“花园会议”

四字在党史界“小荷才露尖尖角”；稍前一篇已提到的李海文，在她那里，提供了陈郁在延安时“交代”过“花园会议”情形的史料线索，方得见“一枝红杏出墙来”——从此，“孤说”不为史家所取的僵局被打破，双莲并蒂，俨然一景。

哦，还有一位差点忘了。写《鲁迅传略》的朱正先生，也是一直关注着龙华惨案，更是很早就引用了罗章龙的回忆，谈及花园会议，严谨求真朴实的文笔，供读者明辨，一版再版，足令人掩卷长叹。

四

从“花园会议”到“西京兵变”，标志着王明一伙统治中共期间爆发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事件的“始”与“末”，若用对内交流的方法，通过党史界来弄清、说清，并不难；尽管拖延了八十多年，如今只在微信网络朋友间发上三两篇旧文，就引起超乎预料的反响，颇感意外。

记得90年代间，刚从罗星原那里得到珍藏的资料、得到口述的启发，接着就开始做起核实性采访，设法扩充并鉴别史料。回想一下，大胆地讨教方家，与李新的接触最难忘且痛心。查日记，在1998年的秋冬间，共十次记有李新的名字。第一次电话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不几天又通电话，径直谈起罗章龙介入西安事变事，他认为不可能，十分笃定地说绝对不可能，因为他派助手去中央档案馆查过，根本没有罗章龙和他那个非常委员会的事。我告诉他，有资料可以寄您看看，等您看了以后，咱们再交流。隔了几天，我打印出一套，11月19日将资料寄出，23日得知他已收到，不三天，再电话，他住院了！随后的日子里，打听其病情，才知老人发病突然，且十分严重。这离寄呈材料也才几天呀，直到他如植物人一般躺了五年多，最终于2004年2月辞世，再没能与他交谈上一句……沉痛的心情，在怀念罗星原时，再次勾起这一幕——沉重的话题，有时会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所以，虽然几度用“骇世”一词来形容密藏的文字，但又如何去向意外不支的长者致歉甚至致哀呢，苦苦提起往事的瞬间，直教人无泪凝思。

其实，我自己也是弱者，心里也曾打过退堂鼓。多亏老连队的一位战友和她的先生，多亏武汉电视台的一位同仁和她的先生，这两家子真善根卓群，一家表示如果我有不测，可以接过培养教育我女儿的担子，一家直接就认下罗星原的女儿为干女儿，接到家里过大年。有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持，鼓动我顺着罗星原提

供的资料，研索到底！没两年，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我写出了《实录与存疑》一文，追踪罗章龙在1936年初夏险些被暗杀之事，河南大学德籍援华教师Tilenz（狄伦子）被误杀，震惊中外。草稿初出模样时，李普逐字逐句帮修改，王若水提供相关片段明确可以作证，胡绩伟帮将打印件转给疑似“线人”的后代……就在2005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邵燕祥，他还提起了这篇“奇文”。当时在座的另一位朋友早读过，曾建议把文章拿出去公开发表，而我觉得，咱弄清楚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事件，主要是“擦镜子”，把“历史”这面镜子擦擦亮，供相关人士自己照照；不必弄成抛钉子，显得到处扎人，更不必搞成“夺眼球”，四处张扬。

就因为中共特科卷入了党内斗争，甚至把对付党外的一套用来对付昔日的同志，我还与专写过特科内况的穆欣联系，讨教那个圈内的点点滴滴，他以亲身经历畅谈了许多，集中在如何认识如何记叙常人想象不到的“自家事”上。

我记得，第一次向李锐汇报罗星原提供资料的情况时，他反应果断迅速，建议去找他同楼的一位邻居，抓起电话就联系，没两分钟放下电话又连连抱歉，言对方不愿意，五十多年了，人家根本不想再谈。那邻居是钱俊瑞的遗孀，名何文，曾是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时的学生。几个月后，我把整理出的罗星原提供资料打印出一份，另请人转交何文看看，她抑制不住心情，邀我去她家中，单独面谈。何文的记忆力惊人，对跟随老师罗仲言（罗章龙当时的易名）的几次同游同行，都能讲出准确的时间，从而订正了罗章龙回忆录中混乱的时间点（也可能是罗章龙故设迷障），依靠何文的仔细回想，史事的原貌才得以清晰重现。

陈独秀的外甥濮清泉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陈独秀从南京狱中获释，辗转滞留武汉时，曾派他去开封找罗章龙重新入伙，折回武汉汇报时说罗身边有一女子“其貌不扬”，陈独秀叹曰“食色性也”，云云。那“女子”正是何文。她可能嗔怪濮的曲笔，特意拿出自己当年的照片，“你看我年轻时多漂亮呀”。何文见到与罗章龙女儿同游青岛栈桥的老照片，很高兴，回忆起那次同行，讲得挺细。后来，直到1939年在重庆，她才跟罗老师分道远离。当时，罗章龙说过“跟我走吧”，何文却已感觉到老师的行踪诡秘，不敢继续同往陕南城固。何文转而参加了中共组织，若干年后终于知道这罗仲言老师就是党内特大号的“反革命”罗章龙，庆幸自己没有跟他走，当然也就不敢对任何人说自己曾是罗章龙亲密的学生。1950年进北京城以后，罗章龙又找到了何文。罗开口向她借钱，可何文与

钱俊瑞都是供给制的人，没有工资，没有积蓄，她硬着头皮去借了钱，才“援助”了“困境”中的罗老师。

其实，罗章龙并不困难，更不缺钱，他用这法子考验何文，观察她对老师的态度，善良如初。放下心来，罗章龙在历次填写各种表格、填写“证明人”时，逢河南大学那一段，就写下他信得过的“何文”。

而罗章龙在西北大学一段的历史证明人，填写的是另一学生刘淑端。刘淑端家住西安，几十年一直在西北大学任教，罗章龙的儿子在新疆工作，往返武汉探家，会在刘淑端那里落一脚转车。刘淑端在晚年写了篇《回忆罗章龙老师》的长文，登在《九十老人母校情》文集中，引起老校友间不小的轰动。她对老师讲授的“全元哲学”印象深刻，依然能阐述出概况要点，条理清晰，大有终身受益之感。当她听说罗星原生活困难，便定期从自己的工资里寄一笔帮助罗星原。师生感情，跨越半个多世纪，跨越山水异地，温馨着三代人。

五

独坐灯下，打开了前面的几篇哀悼文字，又看手机微信上的各方留言，陆续引来的共鸣，悲情流诉，大多盯上了罗星原小心翼翼才吐露的话题。顺着话题，不禁让人冥思：这么一个弱女子，艰难困苦地熬过大几十年，心心念念想留给身后的，到底是什么呢？

既然我恳请党史界记住她，得给大家一个基本的回答。以我同罗家三代以至四代人的接触，感觉可以用“两局棋”来提挈要点：第一代的老人罗章龙在推枰去前已布下两局棋——一局叫学术传承，一局叫往事回忆——让后人接着走棋，一定要下完人生“奇热奇冷”的两大局棋，热可臻温馨流芳，冷亦闻寒锋鸣鞘；若存世，则百年是非终有定评。

先简单说说“热棋”的进展。具体到罗老的学术传承，他早把学术遗稿交给了第二代罗家人，那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子，让儿子负责起学术著作的整理再版事宜，外加公开刊印过的文稿，做出汇编合集。截止刚刚岁交的年末年头，民国时期的学术名著《中国国民经济史》，前有2016年的重印版，接踵而来2020年的“千年学府文库”版，与此并称姊妹篇的《经济史学原论》也在筹划议程中了，有望重新整理再版。假如再算上早期文稿的搜寻编录，明面上的“热棋”，

正升温而蒸蒸然。热，热得浏阳学子，书卷芬芳飘向四方。先前悼念罗星原的“续四”篇中曾提到“全元哲学”，也是载于《经济史学原论》中的重要篇章。

对于若隐若现的“冷棋”，自然是本篇的主题。随着操盘者——第三代的罗家人——罗星原的身影在公众眼中闪烁，背影晃动，她守着罗老往事回忆的长卷散册，已轮廓渐明，柔骨刚肠陪伴着“去易留难”，似燭火微光，开始直逼中共党史界阴森寒冷的冻土层。单单花园会议一小节的思考，就赶在百年大纪念前振动明理者心弦了。

感谢网友们各抒己见，抖搂所知所闻。有一则史料很让人两眼一亮：1979年6月3日李海文给陈修良写信，详细寻问党史上的人和事，前后25条，作为史事亲历者的陈修良认真答复，并留下底稿。此信透露，“花园会议”发生的花园洋房，可能是在静安区的卡德路上。此信还显示出，早在党史前辈专家胡华公开吹风之前，新一辈党史界的眼光已经关注到花园会议了。

花园会议的性质我在“敬答朋友问”的微信交流中说了：“花园会议，若作为‘会议’来讨论，几乎没啥丰富内容与指导价值，什么会议议题、地点、与会者、会议进程等等，均无价值。它的历史意义仅仅在于会议的目的与手段：让不同意见者无条件地服从，不服从者当即开除党籍，随即执行党内锄奸；开杀戒，按表态排队，站对立面者死，顺从者活。四个字：简明，残酷。一天之内‘搞定’，拉开血淋淋大幕。”上上下下的顶杠争吵，正是在这一天出现跌落式的质变：由大党决策者层之间做出表率，竟对坚持不同意见者大开杀戒。高端分歧引发的残酷模式，已正式表明：党内斗争转入你死我活。

一位曾经担任过总书记大秘书的圈内人，总结中共党史有三类烈士，一类死于白色政权的恐怖，一类在红色政权下丧生，还有白色红色两种恐怖共同镇压的亡灵。罗章龙算是白道红道皆不容的幸存者，自“龙华惨案”之后，他深知自己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亡灵争百年是非。旷古“冷棋”夹于白道红道间，一个半甲子前的庚午岁末已悄然布局。异党恐怖呼啦啦退去时，“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罗星原，偏偏成了“冷”接力的第二棒传人，首棒老人在94岁时手书“星原览”正式交棒：存稿“委托你全力照管不得有误”！

又是三十余载冰封严寒，第二棒传人看到了一线春光，办成了一桩大事——《罗章龙回忆录》在大洋彼岸出版，此“溪流版”问世，可望成为传世之作。

虽然未到大抒胸襟的豪放时刻，请允许轻吐憋屈一回吧。且换口清新空气，不辞啰唆，提供一篇旧文的几个片段——

若干年前，有拙文《请关注这宗史料——汇集罗章龙谈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事件的随感》，先谈了自己所知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以及着手搜集资料的动机：

1931年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与随即引发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关联而成一组历史事件，算是党史上的一桩大案积案。面对查阅档案资料屡有难度，依据现有条件动手搜集，达到大概可看清事件原貌了，就汇拢起来试编一下，编成这份资料辑。

接下来又说：

说到六届四中全会，牵涉者概分三派，一是会前得宠于莫斯科、会后开始掌权的一派，二是会前会后持续掌权的一派，这两派即后来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被指控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党内经验主义”的，为首的分别是王明和周恩来。两派之外的第三派，即会前受排斥、会后遭打击的一派，也就是中共党史上通常所谓“分裂党”的，起初通行的叫法是“罗章龙—何孟雄派”（延安整风以后才改口，不包括何孟雄了）。想弄清当年牵涉其间的真相，若史料上出现偏缺，其难堪可以想见。几十年后追踪，前两派的资料基本上是全的，除了少数尚未解密的档案之外，一般不难查找。试编资料辑时，处理这两派资料的方法是列出篇目，标明存书，不再收录原文；偏于难以查阅的，还是照录不弃。余下的第三派，资料显得特别少，总是很难查见。特别是被残酷打击之后，幸存者有限，半个多世纪里还留有什么资料，不用说哪一级领导人曾予关注、就连专业研究人员也未必清楚。

不单是三派各有资料，还有党的组织、重要领导、中外学者等，都曾对此案发文发声，各种资料零星四处，散置而无专辑。鉴于此状，尝试着汇拢资料，先考虑按三个条块编排：其一，由罗章龙那里发散出的，他当年是主要当事人，他的资料十分丰富，基本完整，除去《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是当年的史料，其他均属事后复盘回顾性的；其二，不是来自罗章龙本人的，由

其他组织、人物陆续发散出的，主要是当年就涉及此案的，或是党内回顾此案时特定表态的，或是学者专题研究的；其三，我本人梳理史料时留存的文稿随笔，或者说就是利用前两支生成的，基本是多年探讨过的各种问题，不敢妄言有何论述深度，谨冠以资料之名大胆献芹。

我尝试将资料分作三个部分初步辑成。有关罗章龙，自然谈得稍详细些：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共党史上的各大疑案重新受到关注，相关史料引起正视，六届四中全会一案也不例外。那时，经历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健在者已为数不多，罗章龙算是一位，且是备受打击后的幸存者。很多人想听他谈谈当年高层的实情，中共在职的领导人，如中央的胡耀邦、中组部的李锐等尤为关切，都希望罗章龙开口，通过这位关键人物彻底弄清“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的曲曲折折。他们有机会接近罗章龙，试探性地询问过，后又担心老人最终会把史事带走，而未能留下回忆。同操此心的，还有不少人，且多是富有党内经历的老人。

1995年罗章龙辞世。随后一些年，在他后人的支持下，全套的“罗章龙回忆录”整理完毕，交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2005年9月刊印面世。回忆录中，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党内斗争的文稿，多为首次披露。这些篇章，基本构成了“分裂党”的纪事本末，构成了罗章龙谈非常委员会事件的纲目，其完整的资料性，对于有心阅读或认真研究者，具备了基础性便利。

进而，再稍加回顾：

罗章龙撰写个人回忆录，最先的动机肯定来自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入狱后牺牲前的嘱托——要争“百年是非”呀。最早的构思动笔，则可溯至抗日战争期间，他退出政治旋涡，在大学执教，生活稳定，业余自由。岁月延续，已逢50年代了，他自知生前难以发表，便转入潜心写作。撰写的过程中，正值记忆旺盛，他始终抱有无法消除的特殊顾虑——深知是与政敌继续搏斗。“文革”前夕，回忆录初稿杀青，他布置后人复写誊抄数份，又交代分散秘存妥当。经历浩劫，虽

有一套散失，因有复本，未伤完璧。待重新拣出，只略加补充，并无大幅修改意向，重新誊抄毕，嘱托身后出版事宜，撒手推枰。由此而知，全部回忆所载的内容，涵盖了述主早年从政经历，重要史事的起因结局，几乎没有大端疏漏，其价值恰在凝结了毕生心血；原稿的质量还表明，全宗回忆在交付后人前，就是十分完整的。

完成了自撰回忆录，罗章龙已近古稀年，他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笔。三十来年时间里，他还留有大量的手书札记，继续独自思考。陆续积存下的另一批遗稿，较为散乱，尚在整理中，仅选出几件编入“罗谈非委”。此外，罗章龙擅于诗词，每忆旧人旧事，常以诗抒怀。遗世的诗词逾四百首，与六届四中全会相关的篇目颇为可观，诗句或题注中包含着大量的信息，自然应选入“罗谈非委”。试编下来，主体是构思完整的成篇回忆，辅以单篇的、零星的片段和旧体诗，汇集了这三个部分，才综合而成“罗谈非委”的专辑资料，约20余万字，彰显出历史当事人的亲历其间与痛定思痛。

可以说，曾在中共党史上算是重要一派的史料，将有幸留存于世了。其深藏日久，究竟蕴涵哪些价值，我有自己的粗浅认识，“笔者在着力整理之余，时不时将这批史料跟当前史学界的成绩略做对比，感觉有三个方面值得研究者关注”，简单概括，其一是“人略知，此详谈”，就是说党史学界略有所顾，尚不够全面，而罗章龙所谈却显详致。我举例了“花园会议”的情形，还有在反王明问题上与毛泽东的长期相互利用：

“花园会议”是史界研究的盲点，“罗谈非委”中有好几篇涉及此事。该会本无明确的名称，现取与会者事后的叫法。1978年的武汉东湖党史座谈会上，罗章龙首次对外说出这个会，因过于简略，使得党史界只略知点滴，立马招引来几种反应：有人很快认定了这个会；有人推说未曾听说；有人的回忆绝不涉及；有人查阅档案，取不置可否的态度……可见其蕴含非同一般的敏感性。现在，党史界几乎不提这个会议了。

读罢罗章龙有详有略的数篇回忆，还可找到另两位当事人的回忆，作为补充和互证，一是陈郁1943年在延安写的一份个人自传，他谈到四中全会后参加

过反对派的一次会议，其情形酷似花园会议；再是张金保 80 年代的回忆，她含糊地谈到参加过一次会议，也是非常相似的。……陈、张当时都是中央委员，参加了四中全会并加入了反对派，随后的花园会议，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如何明确个叫法，而不存在是否参加过。

现在可以明确，花园会议是继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又一次性质极其严重的事件。两个会议相隔仅四天，双双触发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成立，导致了上海“东方饭店事件”的发生。花园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提议召开，会前口称要向反对派做解释，以消除对四中全会的误解；实际上是把不同意见的主要干部们召集来，妄图压服他们，如不服从就采取党内除奸。花园会议的会场由中央特科布置，人为气氛阴森恐怖，事先约定以国际代表宣布“统统开除党籍”为动手除奸的暗号。它完全是一场充满杀机的党内会议；它使你死我活的对内残酷斗争从此祸及全党。古今中外篡夺权位和杀戮忠良必然相连。六届四中全会既图谋篡党权，花园会议又预谋杀人，“龙华惨案”再借刀杀人，直至借口“肃反”滥杀异己……步步相连，扩大范围，不足为奇。所以，研究六届四中全会不能不研究花园会议。但是，此项研究同时牵涉到中央特科卷入党内斗争，其深究的难度又特别大。

当时在井冈山抓军事的毛泽东，远离了中央三派争端的漩涡。而他早年与罗章龙深有往来，私交可以追溯到 1917 年新民学会之始。他们与王明都是死对头，两人是如何同王明斗法的，各自的经历，史学界基本都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李锐在纪念新民学会成立 70 周年时曾说，毛泽东同罗章龙二人自秋收起义再未见面，似乎彼此政治上的联系也断了。这一说法的影响颇大。由此观察分析，势必以为他俩在反王明的斗争中是处于隔绝状态中。其实不然。从“罗谈非委”中能看出两人长期相互通气、相互利用既在情理中，秘密往来又有种种迹象，此虽不为外界所知，线索还是很明显的：1931 年罗给毛去密信；1949 年 8 月罗致函毛；50 年代初在北京两人有过直接对话；直至 1966 年间的联系……隐约往事的背后，还牵连着始料不及的异动：30 年代初罗章龙策动三大根据地带兵的领导人（毛泽东、张国焘、贺龙及夏曦）搞党内靖难，随后是各根据地的大规模“肃反”；50 年代初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常委会上重议罗章龙案，随后是王明出走不归；60 年代中罗准备将党史资料单呈毛泽东，中枢系统要津人物悉知，随后是

全国抄家风起，罗家资料遭劫……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云团，纷繁复杂中交织着一条暗线，一笔未了的是非恩怨帐，缠缠绕绕着党的最高权力间的争斗。无论怎么看，都是很值得研索的。

值得研究者关注之二则是“人皆谈，此亦说”，就是外界已有研究，说法众多，而罗章龙另有说法。我举例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东方饭店事件的情况，还有党内左倾宗派集团的形成：

四中全会的会期很短，对于当天的会，罗章龙所谈并不多，他强调会前已形成强大的反对派，会上激烈争吵，匆匆收场，会间没有选举，没有人做记录，这些情况，对于研究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记录”的真伪，有不可忽视的参照作用。对于全会的性质，罗认定它是一次篡党，这与中共最高领导层1943年前后的看法不谋而合，尽管后者很快便在原共产国际的高压下退缩了，放弃理性准则，屈从于实用利害，未能彻底清算王明集团的罪恶——篡党行径，但罗章龙的看法始终如一，认定责任在共产国际东方部，晚年更认定是斯大林企图控制中国党的阴谋。当时卷入上海争斗的中共高层三派，实质上就是篡党、支持篡党和反对篡党三派。罗章龙的排列式是：斯大林为主子，米夫是奴才，王明属奴才的奴才，支持篡党的人更是奴才的奴才的奴才。期待史家留意此提示，把主子与奴才们的阴暗关系查实。沿此思路，从着眼个人延伸至着眼组织，直至跟踪那套体制，不断深思，对整合并驾驭体制的那套学说，满可以入木三分地透视一番。

东方饭店事件一案，案发的原因，实施营救还是继续陷害的党组织应对，就义人员的名单等情况，几十年来始终未能查明。更有惑者，1949年以后参与调查和研究的有关部门从不愿听取罗章龙的看法，大有将其从知情者中排斥的意向。罗章龙独持主要人员系集体被捕说（现行刊印的文论大多说是分几处被捕的），他详细回忆了东方饭店会议，涉及主会场布置和备用转移场地，他的胞弟罗章凤就是负责会议警戒保卫的。读罗章龙的回忆，知道事发原因不仅与“花园会议”有关，案发前还有“石路谈话”一节，柯庆施、夏曦分别登门劝说，看风使舵者与争百年是非者之间，分道扬镳的前夕也曾有过互叹惋惜的一幕。30余

人被囚龙华牢狱后，王明—周恩来—中共中央并未组织过营救，研究学界查档中未见他们商讨救助方案的记载。而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救助、追悼活动，罗章龙有回忆。罗提供的就义者名单和职务，史料价值甚高，对龙华惨案的研究思路将起反拨作用。

党史界谈非委时，张金保的说法颇有影响。她自称接任过非委的负责人，又经她的手将罗章龙开除出非委，并宣布非委解散的。党史界替非委划句号时，径取此说。……“罗谈非委”中有罗章龙驳斥张的文字，揭发了张金保向米夫、王明集团投诚，将罗章龙夫人、胞弟出卖给四中全会中央特科，还有伙同他人卷去非委经费等事。这些，对于了解非委后期的内部矛盾当有参考价值，不宜忽视。

中共党内的左倾宗派，视他们为有着起承关系的集团，并把研究起点推进到20年代中后期，罗章龙不但端出了公开场面上的史事，还有大量上不得台面的见闻。其中，他所谓的“五通神”，勾画王明上台前的五位领导人物（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是丝毫不留情面的，对于弄清在面临篡党危机时，为什么会有股丧失理性的支持力量，弄清历次清查篡党事件的过程中，为什么总会遇到种种阻挠，既拉长了研索的纵向，又拓宽了思考的横面。可能是考虑到外界一时难以接受，罗章龙并不急于公开它，也未能将散笔归成整篇，但他对这一集团的定性则是越描越深的。

接着就是第三点了，“人未闻，此独载”，就是说外界尚不知情，未见史料也无研究，罗章龙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载。举例提到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组织名单，非委的政治文件，赴东北从事兵运、策动三大根据地握兵权者进行党内靖难的信函等：

如何了解非委的组织实体，了解其短暂的政治实践，迄今都是茫茫然。罗章龙认真回忆出的组织系统名单，依现有资料核对，其中央级成员的准确性较大，各地各级成员的准确性尚难判别。无论存真失真孰重孰轻，仍不失为重要的研究线索。他所提供的几份非委文件，可能是海内孤本，史料价值本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又非单纯的原始史料，已经染上了追记复盘的色泽，或许依然可供人们寻根溯源作参照。

非委旗帜下集合的众多组织，早有上下联络关系，其渊源可溯至20年代早期各地的建党建团，为了介绍这一背景，选了罗章龙回忆中的两篇，专谈北方南方建党建团，是80年代公开出版罗回忆录《椿园载记》中应收而未收的。通过《中央工委及全总（1928年至1930年）》一文，不难了解这一组织体系的规模及在中共内部的实力。上述背景性的回忆资料，仅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对中共前十年的组织发展略做回顾，就大致可以回答被长期含糊了的一道疑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下级组织卷入非委，为什么罗章龙能成为他们的领头羊。

几年前，笔者在观察罗章龙生平时，发现自非委事件以后，大约有两年时间去向不明，个人履历和自传中都不愿提及，让人疑惑不解。粗看以为可能与非委内部不和有关，也可能与他被捕事件有关。后来见到他赴东北从事秘密军运的回忆，因涉西安事变，渐渐理解罗章龙之所以守口如瓶，从不泄露半点线索，当然是对被羁押中的张学良的生命负责。罗章龙和非委在东北军中建立组织，直至取得张学良的信任并参与策划东北军兵变，这段后来续出的惊天事变，笔者已有研究成果对学界公开（2000年将文稿交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出版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对他们前期的活动，尚在研究之中。这次编入“罗谈非委”的，略去西安事变的内容不收，仅有他早期去东北一节，也较简略。

前面提到，罗章龙曾给井冈山毛泽东去信，策动党内靖难。他同时还给鄂豫皖的张国焘和湘西的贺龙及夏曦去信，都是同样意思。实属闻所未闻。此非常人敢起之心，罗章龙胆略超人，敢做敢当，留迹于史，任人评说。策动毛、张、贺反掉王、博，策动张学良反蒋介石，可谓罗章龙的棋局急所，对20世纪中国政治盘面的影响，是隐是显，是轻是重，犹待史家发掘梳理。

既收录了几则前所未闻的史料，还可顺便说两段题外话：一，罗章龙与张国焘的关系也非一般，张从延安出走后，他们还在武汉、长沙、重庆多次密晤长谈。罗章龙不以张国焘的新的政治企划为然，毅然志向于学术建国，去开启民智。共产党大军南下前夕，张国焘内心不实，携妻儿远走异乡了，有人劝罗章龙也赶紧走，他凭着自信，自知无愧于共产党，无愧于中华民族，一步没动；二，贺龙、朱德加入中共组织的前前后后，另有波澜起伏，并非现知的仅与周恩来发生关联的少许故事。这些题外内容，不见于“罗谈非委”，见于罗章龙的全套回忆中。

综合一下，上面三个部分，述及当时中共党史界的研究现状，与罗章龙留存资料间的关系。如果把前者称为“外界”，把后者称为“独家”的话，那么外界的“略知、皆谈、未闻”，恰好对应着独家的“详谈、亦说、独载”，不谓牵强³，大体已概括殆尽。可意犹未尽，我继续写道：

透过这番对应，非委的起因已在其中，人们不难知其始知其末。尤值得点睛一笔：正是凭罗章龙的“独载”，非委的“始”与“末”，才以全貌首次进入史家眼界，难能可贵。但愿“中央非常委员会”不再是说不清的遗案。

余味且足资关注者品读的，恐怕不止这三个方面，甚至会层叠而出。就说党内斗争中的各种“违心”吧，违心附逆、违心检讨、违心揭发……何其多也；一批又一批的“违心”人，不耻而为之，甚至厚着颜面自称是“出于党性”。如若追究党内“违心”之风成于何时，始于何人，认真地讨伐“违心”之祸，以所谓的“党性”来衡量，则难辨是非，唯有原本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的磊落之人，才有资格来剖人剖己。

我感觉，读史的许多要点，已被罗章龙的“冷棋”道破，深层的思考随之而来，记下肤浅的点点滴滴，聊作人生的一段补课：

“乞火无人作蒯通”——罗章龙在晚年吟起了杜牧的诗句，似乎还为当年未遇说项解纷之人而叹息。其实，无论国有几党，党有几派，一旦信奉斗争哲学，蒯通再多终难显神明。宽容才是双赢的真谛，才是吹散纷争、化解僵持的春风。

“我完全反对你说的一切，但是我坚决保卫你发言的权利”，也应该成为中国公民心中的准则。以人为蒯通不如以制度为蒯通。相应地在立国宪法上确立多党制以保障党与党平等竞争国务，在党章上确立多派制以允许派与派平等干预党务，才是正题。陈独秀、毛泽东都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治党治国须走现代民主宪政之路，治史治学须走现代学术自由之路。为此，收集汇编中共党史的相关资料，把当年不曾宽容的各方“容”到一起，期望能为自由的学术添点儿积累，能为政党派别间增长宽容之风提供借鉴，推动政治场上的“零和游戏”变为可和、有和。

文章临结束时，我就自己试编的资料辑写道：

辑中又以“罗章龙谈中央非常委员会”为主，献诸方家，见仁见智，抒怨抒叹，甚至是呵斥，尚难预料。而拓开史学视野，触发深思，或在情愿与情理之中。惟不辞个人微薄，继续勉力，把共产党高层争斗的内情史料留得几许，以期适应从学理上探讨现代政党的有序从政。虽未必能得到预期的回声，或是仍值得尝试一回吧。

史学中有“无征不信”的规矩，意在重视史料验证事实。史料不周正，史源不清，史实也不会清楚，自然出不了信史。

行文至此，已大致回答开篇提出的问题，罗星原这么个弱女子，艰难困苦一生接棒交棒，而“棒”中到底藏着什么精神财富呢？于此还需赘言吗！

本是为罗星原的“七七”而燃香敲键，打头那一行且已反复吟哦：“请中共党史界记住她”！这九个字，恰恰与今天大引特引的旧文稿中最末的一句相呼应：“面对中共党史上未弄清又隐不掉的旧案，我愿道一声：请关注这宗史料。”

大寒刚过，立春在望，知冷观棋，奉心香而抛下不冷之语——请记住罗氏祖孙呀，请关注他们守过的“奇冷”吧……❏

【评论】

阎淮著《进出中组部》一书读后

——一位“第三梯队”候选人的独特人生

于向真

半年前，朋友圈盛传有本顶好看的新书《进出中组部》，作者是1982—88年供职中组部青干局的阎淮。刚巧当时我所在的“文史讲堂群”的群主孙怒涛大哥与阎淮是清华校友加多年好友，于是我近乎耍赖似的向孙大哥索要到这本书。

今年初春，阎淮先生从洛杉矶回京不久，我联系到他，获准见面一聚，聊了半日意犹未尽，阎淮大哥在书的扉页题词赠我。读书几十年，《进出中组部》是最耐看、最好看的个人传记之一，尤其对于关注中国前途，忧虑“一连串后空翻”困窘现状的人们，书中列出多项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作者记叙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春风吹拂时一线理论学者们探索的足迹；现场见证过30年前血雨腥风夜锥心刺骨的伤痛绝望；描述了政改罗生门、经济跃进单腿蹦造就的巨婴怪胎；帮我识别道德塌方、割肉买盟的踟蹰困局。读阎淮先生此书，有助认清历史教训，辨明正确方向，真是一本顶好看的书！

昨日小聚，老友薛姐说起之前被警局传唤，原因是她用手机看罢山区无路，妇孺攀爬的小片，忍不住在微信群吐槽：“为什么大撒币？为什么不修路？”。警局质问薛姐微信名“自由人”有何居心，要求解释含义。哦呵，有关部门太牵强了，薛姐玩微信时恰逢刚退休，感慨“退休了，不用朝九晚五坐班，终于成为自由人”，并无粘联“主流价值”之意。接下来，警员指出薛姐吐槽所在的退休群，群名3个英文字母遭无关部门怀疑“是某组织名”？哎呀，又多虑了，那3个拼音字母乃薛姐工作单位名称缩写，与结社组派全不搭界。当面消除两大嫌疑后，警员也表示对巨额外援的不满，好心告诫薛姐以后避开敏感词，不再发议论。薛姐按警员要求写“认错书”并签名、按手印后，才被允许离开警局。

去年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因在微信群说了句“第3代领袖做过、被证明是错误的举措，今上就不要再做了。”谁承想后果严重，被警车带到派出所空屋中长时间反省，被指“恶毒攻击两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后经全面调查我的过往表现，认定是个“遵纪守法、积极参政议政、成绩突出的民主党派”成员，“好心说了错话”，被保证“下不为例”后一笑了之。言论监控到如此杯弓蛇影的苛刻地步，让我们为来自顶端正四下蔓延的惧怕虚耗掉的巨大成本扼腕叹息，也让我对刚看过的《进出中组部》一书的现实意义有了切肤深刻的理解，促使我坐下来写这篇读后感。

《进出中组部》书中最吸引眼球的亮点，当属阎淮在中组部青干局的亲历记，身为红二代中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接受过优质基础教育，考入最优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十年动乱，别人打派仗时他先是迈开腿搞社会调查、继而广览政经名著，工作后基层历练从工人到厂长、进部委从技术管理到部长机要秘书，一步一个脚

印积累知识与经验，顺理成章蓄势将才干喷发于80年代，为昙花一现般的政治体制改革冲锋陷阵。之后30年，他独步国际舞台，进退有据，竭诚奉献，屡有斩获，成为政治舆论界有说服力的新闻评论家。阎先生这本书，歌咏出当代社会众生相一曲另类咏叹调，令读者耳目一新。

捧读此书过程，作者的不少观点让我赞叹，也存些许遗憾，下面择要而言：阎淮父母是早年投身抗日救国的新四军老战士，阎淮接受过同代人中最优教育：小学就读干部子弟寄宿制校园，中学在京城录取分数最高的重点名校，继而高分考进清华大学，天之骄子的地基坚实傲人。十年动乱中他快速警醒，从社会底层调查到博览内部群书，率先唤醒独立思考，在职场上一路打拼、扎实奋进，凭借满腔社会责任感与实干才能，作为主笔撰写出被纳入党的十三大文献中最出彩、最关键的干部改革方案。“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这句话，40后、50后的所有同胞都耳熟能详。十四大硕果被搁置可叹可悲，但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阎淮等8名当年组织部的精英才俊的力作《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设想》，以及被写进十三大政治报告《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精彩内容，其前瞻性、正确性乃至可行性至今仍未过时，仍值得期待，待到冰消雪融宪政开张那天，这份重要文件必能重现光彩。依我看，多项内容甚至无须大修改就可以直接利用呢，阎淮和为政改披荆斩棘者们的心血终究不会被湮灭，这块真金总有闪光发亮之时！

对阎淮在书中提出的反贪肃贪四步骤，我高度认同：启动政改、健全人事制度，使干部不能贪；健全法制、全面市场化，使干部不敢贪；加速行政改革、实行中薪养廉，使干部不必贪；放弃说教、建立职业道德，使干部不愿贪。反贪是国人最大心结，旷日持久的一盘乱棋，唯有落实阎淮指出的四步骤，早日启动政改，更新机制和土壤，才有望走出越肃越贪持续沦陷的泥潭。

阎淮呼吁大陆知识分子要把人性、人道、人权放在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之上，这一提法貌似寻常却引人关注。试想，对待宪政之路与普世价值这类常识，能身体力行和勇于坦言的知识分子，是30年前抑或70年前占比高呢？还是今日占比高呢？深层原因又何在呢？阎淮原本在体制中根基牢靠前程似锦，80年代就身居要津，与第三任最高领导人有深厚密切的交情，因30年前目睹残暴镇压而决绝离开，其后服个软说句认错话即可重获既得利益，难得他勇往直前，视违心获

利如草芥。对此多数人恐怕难以理解，因与作者有家庭出身、成长环境、价值观相似的缘故，我与他待人处世的心态高度契合，所以认同那份坚定合乎情理，对他远超我辈的境界也颇为赞赏。

书中，阎淮推崇台湾著名企业家殷之浩先生常说的话——“人，必须活得自尊和骄傲”。是的，唯有良知自尊者方能拥有的豪爽骄傲，是大写的人独享的货真价实的人生高等体验，是超越物质享受的精神奢侈品，美好且稀缺，可追无处买。如有之，恭喜贺喜，您真没白活一世。

阎淮对“要不要给领袖面子？”这一问话的解答，没有丝毫遮掩，没有半点纠结，直截了当干脆利落：“要看他给不给人民里子”，好爽快也，不能不赞。孟子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君和社稷总会变换，老百姓才是万古不变的主角。连古代先贤孟子都认定得民心者才能做天子，危害到国与民的国君就应改立，国家是为民众设立的，领袖应是公民推选出来的。百姓是国家之根本，根基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了，这是面子与里子的主次关联。

如今，量子技术都终于成功落地了，文明与进步势不可挡。执掌国家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国家利益应当是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体现，以法治民驭民上升为依法治国治官势必成为共识。共和国中，每一个守法公民都是主人，都是可宝贵的，都该拥有不可欺瞒、凌辱与践踏的尊严，确保人权，才能有效杜绝假借“国家”之名侵害民众的谬罪肆意蔓延，违背人性、人道与人权的谎言与暴虐，当休矣！

读此书，对作者一生经历有两点遗憾：一是1983年10月，中组部青干局要员赴河北〇正〇定考察的结论，疑似掺杂了先入为主的阶层好感，被“老实”障眼，没看透缺乏大智可能埋下德〇不〇配〇位的后患。我明知这么说很没劲，事后诸葛好当，却还是十分遗憾阎淮他们失去及早除祸的一次机会。

二是作者1997年离开新加坡重要舆论岗位，无意间为其后“小骂大帮忙”的抬轿人腾空儿铺了路，终归也是一桩憾事。

近年我在新加坡帮忙照顾孙辈，耳闻目睹，感觉阎淮书中对新加坡的社会全景描写甚为真切，大有同感，更对他貌似草率离新感觉遗憾。

当我读到阎淮记叙2016年4月清华老校友反思会，竟然三易会场的曲折经历，不禁回想起自己三年前因在博客发表文革亲历文章遭跨国约谈，被警告“不

许出书”；今年清明节又发生因支持许教授讲真话在公开信签名，微信再次被“永久封号”。有了种种与作者类似的际遇，也是我写书评由衷夸顶好的缘由。

总之，《进出中组部》是本能引发广大读者共鸣的、顶好看的新书，作者阎淮是个“一朝被蛇咬，十年不怕蟒”的真汉子，他顶着风险披露历史真相，点评时政的勇气与担当，闪烁在字里行间。政治学人之路艰辛漫长，好在不受年龄限制。期盼阎淮保重身体，挺立潮头，持续发声。📌

【述往】

周扬女儿的回忆：苦难人生十二年（一） ——文革初期，风云突变（1966.6—1969.8）

周 密

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现在人们一说文革，就只剩下“抄家、游行、贴大字报、开斗争会”了。事实上，十多年漫漫长夜，人们都干了些什么，怎么熬过来的，那段历史可能比八年抗战更惊心动魄。我的同学、朋友、周围的同事们，几乎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但为了维护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不便都写成白纸黑字的“伤痕”文章留于后世。

岁月流逝，“伤痕”慢慢地淡化了，记忆却从未消失过。平静地回忆往事，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大概现在已算不得罪过了。

我的命运的转折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在这之前，生活一帆风顺。童年，在解放区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中度过，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作为孩子，可没有什么“艰苦”的感觉。有父母的呵护，周围叔叔阿姨们的照顾，老师同学的关心，我就这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像匹小野马似的满山乱跑着长大了。进城后，中学、大学，凭着一点小聪明，学习也不错，就是有点任性。同班多是大姐姐们，对我很宽容体贴，老师们也都很喜欢我。当然我也不是不挨批评；偶尔挨了批评，受点委屈，掉几滴眼泪就没事了。

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的高科技机密单位，干的是最光荣的工作。丈夫

叶华明，是青梅竹马时认识的，名将叶挺将军之子，五十年代的党员，我们同在莫斯科学习时谈的恋爱。我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他在莫斯科军事学院。他学习成绩优秀，是极少数金质奖章获得者之一。毕业后我们一同分到七机部，他在二院，我在一院。在当年，他长得一表人才，我也是本地有名的漂亮姑娘。我们是被许多人羡慕和嫉妒的一对夫妻。我们沉浸在幸福之中，丝毫不会想到即将来临的那场浩劫，会彻底改变我们后半生的命运。

对于我来说，文革是从1966年初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父亲真正得到平反为止，整整十二年。十二年，是一段曲折的生活。现在回忆起来，我分三个大的阶段来叙述。

一

对我来说，1966年开年就不吉利。一月六号晚上，我从甘肃四清回北京。不记得为什么没有马上回机关自己的家，大概是为了先回父母家洗洗澡；四清五个月，一次澡也没洗过。也是为了看看养在父母家的女儿阳阳，她已经三岁半，准保又长高了不少。

我们搞四清的甘肃天水娘娘坝区，老百姓穷得叫人心酸。回来时，许多四清队员把能留下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们，我也如此。所以下火车时，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棉军装和挎包中一点必用物品，就这样进了沙滩中宣部子弟堂的院子。大约是晚上9点左右。通常，这时父母都在自己房中工作，我期待着对我的亲热接待。他们往往都会走到客厅，问长问短，妈妈一定会叫阿姨给我弄点热乎乎的东西吃；然后，一会儿催我快去洗个热水澡，一会儿又叫我快去看看女儿（她肯定已经睡了），弄得我不知该先做什么好。

然而，等待我的是漆黑寂静的院子。我看见妈妈卧室似乎有点暗光，走进去叫了声。妈妈斜靠在床上，满脸疲惫，见我突然进来，好像也没什么大反应，然后平静地说，你爸爸住院了，肺里长了个东西，这两天开刀。

在我记忆之中，父亲身体一向很好，从不生病，也极少休息，乍一听这个消息，真是惊呆了，禁不住眼泪簌簌流下。妈妈简单地说了几句病情，催我去睡觉，说她明天还要上医院，累了。我回到自己房中，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妈妈没让我去医院，我休息整理了一下，就回机关了。

父亲刀口拆线后，我才去看过几次。肿瘤长在那最小的右肺上，所以把那叶肺全切了。为此，还锯断几根肋骨。看着父亲侧身那半尺左右长的伤疤，我不知该说什么。那年他五十八岁。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体检时查出来的，医生马上请示中宣部长陆定一伯伯，问要不要直接告诉周扬同志本人。陆伯伯痛快地回答，告诉吧，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在乎这种消息吗？果然，父亲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当天母亲彻夜辗转无眠，他自己照样呼呼大睡。

为他主刀的是黄家驷大夫，当时中国胸外科第一把刀，手术十分成功。直到1989年7月父亲去世，他的癌症没有复发过。文革中我看到过这样的大字报，质问黄家驷大夫“为什么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开刀、治疗这样用心，并且从此停刀？”当时黄大夫年事已高，给父亲切除肺癌的手术确是他“最后一刀”，这也成了黄大夫的“罪状”之一。时间过去近四十年了，黄大夫也早已仙逝，但我至今从心底里感谢和尊敬这位医德技术皆高的黄老先生。

术后，爸爸既没化疗，也没放疗，只是妈妈保证他天天有炖鸡汤吃。春节后不久，大约是2—3月，父亲去南方无锡休养，也带着我女儿阳阳一块走了。后来听说，是上海市委书记邀请他去的。在上海，张春桥还登门拜访，表现得十分热情谦恭，谁能料到他们同时正在策划着“3月18日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呢。

这叫我想起了原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伯伯被“揪出”的过程。1967年春，文革小组叫他去人大会堂参加个什么大会。入场时见到江青，江青表现得十分友好热情，握手时还说：“好名字，好名字，一年之计在于春么。”张问：今天开什么会？江青说：不知道。大会开始，方知是“刘少奇社教工作路线批判会”，随着一阵口号声，张际春伯伯突然被揪上台挨斗、挨打。第二天，他的夫人，童养媳出身的、经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罗屏阿姨，因没能承受得了这突然的打击，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谁能料到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竟如此险恶可怕！

我住在机关干自己的工作，那时代通信没这么方便，和父母基本没联系，开始只收到过妈妈来自无锡的一封平安信。直到文革大炮轰到父亲头上后一个多月，8月份，因接到要我们去接女儿阳阳的通知，才知道他们早到了天津。

四岁多的阳阳第一次踏进自己父母的家，两居室套间中我们住16平米的大房间。开始她有点奇怪，为什么“新家”只有一间屋子，老吵着要回“老家”——沙滩子民堂。上班时，我们叫她自己在院子里玩。那个时代，套间的门不锁，

有时房间的门也不锁，我在公用间给她留一杯开水、一点手纸和一两块糖。现在早都不用了的粗糙的灰色手纸，当时还经常断货，我上街只要能碰到，就尽量多买点存起来。至于糖票，每人每月好像是二两，一家三口的糖只够供阳阳的。孩子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她什么也不问不说。有几次下班回来，见她独自一人坐在楼门口台阶上，对于我的提问，她只是淡淡地回答说：“他们不跟我玩。”有次晚上给她脱衣服，毛背心和衬衣里面抖出一堆沙土，问怎么回事，她也是平静地说：“他们往我脖子里塞沙子。”四岁多的小女儿，从不主动向我诉说她在外面碰到过什么伤害。我多少次背着孩子拭去眼泪，有时泪水涟涟止不住，被她发现了，她也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我。很快，她就由一个特别喜欢管别人闲事的、善良的小公主，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倔强的小姑娘，学会了反抗、打架，但自己很少哭。我们家的人，无论是我和女儿们，还是母亲和我，在苦难降临或劫后重逢时，从未有过电影、电视中那种抱头痛哭的情景。亲人间的相见和别离都是异常平静的。若说文革有点什么好处，那就是把我们全家都锻炼得坚强、冷峻。

好在阳阳被“放羊”的时间并不长，9月下旬，华明就想法把她送到单位幼儿园了。她长得漂亮、高大，又爱劳动，所以幼儿园的老师们，不管是哪一派的，都对她不错，我们也就放心多了。阳阳在七机部永定路地区二院的幼儿园、小学度过了童年，独立生活能力很强，六岁就会蒸馒头，做简单家务。难怪有位名人说，儿时的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文革的大环境也造就了她坚强勇敢、独立思考和桀骜不驯的性格。如今四十多岁了，依然如此。

二

七机部永定路地区是个有几万人工作和生活的大院，从1966年9月15日和9月16日起，就正式分成了“915”和“916”两大派。“915”中大部分是政工线上的干部和领导，“916”中大部分是技术人员和技术领导，工人则两派都有。

从1966年7月1日正式揪出文艺黑线上的祖师爷、大红伞周扬起，整个下半年，中央大报、新闻广播、院内的高音喇叭、各地小报小刊、大字报、传单等等那个年代的全部媒体，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听到“声讨”“批判”“揭露”三反分子周扬的文章和声音。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辞，时时在刺激着我的神经，我心

惊肉跳，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叶华明整天阴着个脸，一言不发，从未说过一句劝慰我的话。当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劝慰我，他自己也不轻松。

几天之内，我就成为永定路地区的“新闻人物”。来自素不相识的人们（大多是半大的孩子）的白眼、谩骂、扔石头、喊口号……我独自承受着这一切倒也罢了，可连幼小的阳阳也跟着遭殃。有次阳阳发烧，我背着她上医院，刚进大门就碰到几个“红闯将”，他们冲我大喊“打倒周扬”，孩子哇哇大哭，说什么也不肯进楼门了，我只好把她背到医院院子里休息。也怪，哭了一场，晒了会太阳，她倒退烧了。后来，我买了几本中医书，小病小伤基本自己治。以后，她5岁时的腮腺炎，再后来她们姐俩出水痘，都是我先诊断出来的。

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当上“反革命分子”，但作为“黑帮狗崽子”，已经是被打入另册的人了。从1967年起，随着老干部一片片倒下，周扬已经成为“死老虎”了，我承受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些。也可以说，自己是麻木了些而已，内心的阴影却越积越深了。1966年下半年，是我此生最痛苦、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作为周扬的独生女，没有人与我分担压力与痛苦。我自己活得再苦也能挺过去，可是阳阳将来怎么办？那年月，打死打伤人是常有的事，我这种人被打死也不需要任何人负责。又风闻叶华明的一个亲戚劝他和我划清界限，离了再找，叶华明拒绝了。思前想后，我想给阳阳生个弟弟或妹妹，叫她不再是独生女，在人生的路上有个血浓于水的伴儿。开始华明反对，因为处境艰难，后来勉强同意了，他很想要个儿子。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在王洪文的领导下先夺权，随后各地也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各派头头与骨干们忙着进入“一片红”的领导核心，大多数群众慢慢地逍遥起来，这正是个怀孕生孩子的好机会，大院出现了不少“妇女挺进队”。光我们室这年秋就有五个女同志怀孕了，我是其中之一。1968年4月快到预产期时，我不得不到外地去，因为我认为北京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我在这儿生孩子。

文革开始头半年多（1966年5月至1967年2月），在文革中打头阵的那批红卫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他们造反有理，破四旧，打砸抢，抄家，全国大串联，遍地开花，的确起到了梁山泊好汉李逵的作用。后来，这些人不知怎么成了“联动分子”，头头们大都作为“516分子”给抓起来。到1967年春天之后的夺权时代，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成了文革的主要战斗力量。几乎各

地区、各城市、各单位都分为两派。在北京市，当时的“915”属于“天派”阵营，“916”属于“地派”阵营。常有毛主席“最高指示”下达，有时似乎对这一派有利，有时似乎又对那一派有利。所以，有时候这一派占上风，有时候又是那一派占上风。所谓占上风，就是比较容易地把支持对方的领导干部（院、所、室或局、处、科三级）和头头们拿来批斗一番。

这种派仗就连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卷了进去。我们室有位同志去割扁桃体，打完麻药后医生和他辩论起来，结果动手术时麻药作用已过了一半，割第二个时把他疼晕了过去。

武斗也越演越凶。各派都有年轻人组织战斗队，“915”有“红闯将”“916”有“红卫兵”。大院生活区也大致划分了地盘，不小心泄露身份就可能被打一顿，也有极个别被打死打残的。当然，比起外地来，北京武斗死的人还不算太多。

这种环境，我敢在北京生孩子吗？所以我们决定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就选定了广州，那儿住着叶华明姨妈全家。他把我和六岁的阳阳送到广州后住了几天，就回北京了。我们娘俩留在了这个陌生的、语言不通的城市里，反倒觉得压力比在北京小了一些，一来是周围人不知我是谁，二来，也是最关键的，是受到了姨妈和几位表弟妹的热情关怀和帮助。

三

叶华明的母亲李秀文出身于官宦人家，只有姐妹二人，姐姐李秀英的丈夫，解放前也帮助新四军做了不少工作。妹妹李秀文嫁给了叶挺将军，有九个子女，在战争年代，这些孩子们都是在外婆家生养的。姨父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去世了，姨妈有六个子女，前四个都受过高等教育，也已成家，最小的老五全德、老六全宝赶上文革，没有大学可上。全德在工厂，但工厂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全宝毕业等待分配，所以这俩算是家中的闲人。

姨妈一家住在解放初期政府拨给的老房子里，我一去，姨妈就把自己的卧室——二楼正中的一间屋子让给了我，一板之隔的后面便是老大全盛夫妻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我很快便被接纳到这个大家庭中，他们对我推心置腹，使我感到十分温暖。1968年5月5日（正逢马克思150周年诞辰）我在街道保健所生了东东之后，6岁的阳阳就常由全德带着玩，他把她放在自行车前架上满城地乱跑，

还去找有武斗的地方看热闹，回家后照例要挨姨妈一顿臭骂。全宝帮助母亲做饭，包括给我坐月子饭。坦白地讲，那放了不少当归、白芍等药材而又不放盐的鸡汤真叫我难以吃完，只好背地里求阳阳帮忙。阳阳问，这汤上漂着一层黑的是什么？我说这是胡椒，去风的。她端到亮处一看，说，妈妈，这是一层蚂蚁呀！原来，广东的老房子厨房共对天井，光线不好，又潮，做好的饭菜放在灶台上就会有蚂蚁爬进去。我想蚂蚁也没啥了不起的，反正都烫死了，就叫阳阳不许说，全部喝下去，常这样，也没有事。早餐他们常为我上街买菱角糕、粽子什么的，甜的咸的一块吃。北方爱吃茶叶蛋，广东月子婆吃姜醋泡蛋。虽然有些吃法我很不习惯，但这是他们对我的尽心照顾，我也尽量表示很有味地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天气热，我奶水不够，东东胃口好，奶头嘞出血，痛得我直冒汗，她还吃不饱哇哇大哭。有几次夜里吵得隔壁大嫂也睡不好。问明原因，她把东东抱过去喂一会儿。所以，东东刚满月就加喂炼乳，让她很早就习惯于喂牛乳，也好。产后不到50天，我就接到令我回北京的电报，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我把东东暂时留在姨妈家，只带着阳阳于六月底返回北京。总的来讲，1967年秋至1968年夏，我完成了生二女儿东东的“战略计划”，下一步就是我当“现行反革命”的人生阶段了。

四

1966年初春，我刚从农村四清回来，单位就开始了“科技革命”。七机部派了工作组，先到我们所——一院十二所试点。我们第一研究室是搞控制系统设计的，大学生多、留学生多、高干子女多，因而又是重点的重点。于是，每星期的政治活动时间（星期六，直到80年代初，是雷打不动的政治活动时间）就是开会给领导提意见。那时还没把他们上升到“走资派”一级，但形式上也和农村四清类同，干部们都得“下楼”，就是检查过关。领导干部们个个检讨上纲、痛骂自己，甚至涕泪交加。大部分人第一次都下不了楼。好在不久，革命对象的级别又提高了一层，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学习讨论文艺革命的伟大意义。一天到晚地开会、读社论、写批判文章。我是个平头百姓，平日只重技术，讨厌开会，又是个出了名的大炮筒，活到三十岁，没碰到过什么不顺利，所以开会时一轮到我发言，便口没遮拦地胡说一通。当时的想法是，放着一大堆技术工作不干，成天干这劳什子，真把人烦死了。导弹设计和文艺革命有啥关系？

不就因为江青是毛主席老婆，有人为了拍马屁，提高她的地位，才搞得全国上下都来闹“文艺革命”么？心里这么想就顺嘴说了一句：“都是江青闹的”。现在看来，这种想法真是太傻了，可当时的我就那么没头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一场台风即将把我头顶的房盖掀掉。到“彭、罗、陆、杨”被揪出来时，我还感慨地来了一句“伴君如伴虎呀”。至于有关清官贪官，现代京剧、中间人物论……等等，我更是“谬论”多多，老是喜欢来一番自以为是的议论，好像专门要和主流对着干。部里派来搞“科技革命”的工作组一直没走，始终在我室蹲点。其中一位成员原本也是我们室的，后来才转行去搞政工了，我一向视其为老大哥，关系也不错。老大哥颇有政工人员的沉稳气派，每逢开会，大家轮流发言（不能不讲），他则默默不语，拿个小本记录。每次最后请他“总结”，则总是谦谦地说，人家谈得都很好，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万万没想到，他的这些记录，两年后的1968年秋天“清理阶级队伍”时派上了极大用场。

到了1968年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七机部。这叫作“掺沙子”。他们一来，首先打破原来的科室建制，全所六百多人统一编成班、排、连。我们一室因是“三多”单位，自然是要重点清查的，大多数人编在了一连一排。另外同时也成立了群众专政队，主要是从后勤杂工、车间工人和机关八大员（资料员、打字员、保密员……等）中选出来的，都是贫下中农出身而没有什么学历的同志。

接着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天天开会，听完工宣队领导的训话动员之后，便“背靠背揭发”。情景颇像学校考试，各排的人都集中到大一些的办公室里，每人每天都要写出几页纸，揭发别人或坦白交代自己一切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思想，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否则不得过关。全所人员按阶级分了好几等（和我们农村四清时差不多，只是更可怕一些），我这样的“黑五类”（后变成“黑七类”，即地、富、反、坏、右、叛、走资派）是重点清理对象，和这类人交往多的，是“知情者”，他们的任务是“全面彻底揭发”，群众专政队自然是工军宣队的依靠对象。每天，大多数人铁着脸，相互不许交谈，面对几张工宣队发的纸，搜索枯肠，一定要写出点什么。

五

我室第一个被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我的工程组长阮崇德。此人

也是晋察冀边区联中来的，后留苏，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工（相当于中国的清华）。从1961年春起，他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此人精明强干，业务好，工作能力又强，更兼能说会道，开口必“语出惊人”。这种锋芒毕露的人，难免遭人妒忌。他虽算不上走资派，但说他“操纵着十二所里的走资派，诸如梁思礼等人”。上午约九点，我们正在办公室里“背靠背”，走廊里响起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阮崇德！”的喊声，接着便拥进一群人，前面几个专政队的大汉在工宣队的指示下，一齐走到阮坐的椅子边把他拽了起来，然后扭住胳膊往外走。他不服气，红脸直脖地跟人家争论什么，于是便遭到按脑袋、拳打脚踢的对待，被强拉出去了。我看着背上起了一片冷汗，心里明白，很快就轮到我了。果然，下午上班没几分钟，也如法炮制地来揪我了。幸好，上午揪走阮后，工宣队一位老赵师傅提前给我吹了点儿风，说群众运动不是“绣花”和“请客吃饭”，叫我“相信群众，相信党”，被揪时千万别顶嘴别反抗，他们会派两个女同志来押我，不会扭疼胳膊。他没食言，我也很顺从，所以揪我的过程很顺利。

我的主要罪行，便是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工作组那位老大哥笔记本中的大量“反动言论”更证明了我对文革的“刻骨仇恨”，说明我一直想“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老爸——周扬翻案”，所以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其实，文革之前，我对江青并无什么反感。小时候在延安见过几次，记不清了。解放后，只是1964年秋有次跟爸爸去看《红灯记》见过她一次，印象倒是朴素、热情，对爸爸和我表现得极为亲切友好，还唤我的小名“咪咪”。1961年春节，我休假期间曾和父母一起在广州省委招待所住过几天，一次和一个女服务员一块在院子里遛弯，走到江青曾住过的一幢楼不远，她说，江青住着的时候，这一带不让人走，因为她有病，怕见人。若是看见有人在这附近散步，她就会大发脾气。我挺纳闷，说这不是神经病么！年轻时，心里一点也整不住话，有一次，竟把这一想法对我的搭档说了，但也只说到“江青可能有点神经病”。这位搭档更是无遮拦，又把此话说给了同房间的室友。

1968年“清队”时，这位积极的室友背对背揭发了这件事，工宣队找我的搭档核实，她不会说谎，只好如实坦白交代。我当了“反革命”，她又十分后悔，找工宣队去解释，说“神经病”不等于“精神病”。在一次下班路上悄悄塞给我一封信，表示后悔，并详细地从医学角度证明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劝我去向

工宣队申诉。即使在当时，她这封信也叫我啼笑皆非。谁都明白，我这样的背景，抓我是必然的，管我说过什么话呢！后来不少同事劝我疏远她，和她讲话要提防着点，但是，我很了解，她不过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北大毕业的高才生，二十多岁，一脑子天真烂漫，绝对相信党报说的话。又因父亲是有名的非党技术老专家，也算是出身不好吧，胆子就小点。实际上她的“揭发”中并无虚妄之词。在以后的多年相处中，她再也没有上当去“揭发”过什么人。我和她一块儿去四清，1969年秋又一块儿去军垦农场下放劳动，几十年来，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六

被揪出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七机部永定路地区，上下班的马路上也时时出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密”的墨刷标语，甚至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都见到过。走到哪儿，人们都在背后指指戳戳，叫我深深体会了当“过街老鼠”的滋味。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藏到一个没人认识没人看见的地方去，哪怕是个洞穴，或是远在天边的什么角落。所以我总是提前上班，推迟下班，最喜欢冬天，因为天黑得早，总之，不愿意见人。人们那种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好奇的、幸灾乐祸的目光使我感到愤怒和屈辱，但也无可奈何。

我被揪斗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有时候是陪斗（陪阮崇德），有时候是自己当主角。但总的说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打倒我的大标语从永定路一直刷到天安门，我却从来没有在露天广场被批斗过，总是在办公大楼里较大的会议室中，与会者三五十人到百余人不等。头几次我挺紧张，对批判我的不实之词还想辩解几句，后来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听你的。我也慢慢习惯了。其实，这类批斗会也是很程式化的。

先被领到隔壁的一间办公室中，老赵师傅每次都叮嘱一番。押我的也是同研究员的一位女同志，比我小七八岁的计算员小狄。批斗我时，她要一手抓着我胳膊，一手压着我的后颈，使我能摆出标准的“喷气式”姿态。所以，在等候这一场面时，她会轻声地提醒我要顺着她的劲来，不要拧着，这样就不会疼。准备妥当后，一听到走廊里传来“把反革命分子周密押上来”的喊叫声，我们就奔赴会场，在一片“打倒×××！”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中登场。然后

批斗会开始。首先是几个人发言，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声讨我的“罪行”；然后是我来回答革命群众对我的一些质问，诸如“你是如何伙同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你如何为黑老子周扬翻案的？”等等。我当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还必须得回答，所以我常常答非所问。但是，不管我说什么，最后一一定是得到一片“打倒”声，或“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喧嚣。然后，会议主持人大喊：“滚下去！”我便如大赦般地松了口气，赶紧下台。

全所先后总共揪出了约30个“现行反革命”。后来当了十年航天部部长的刘纪原也在其中。刘和阮崇德中学、大学都是同学，1960年春分到我们所之后在另一个研究室工作。我知道他精明能干又肯出力，倒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反动言论”。不过，有母亲刘亚雄、姨父安子文、刘有光这层关系，他就在劫难逃了。安子文等人是所谓的“61人叛徒集团”成员。1936年，他们61人在中央的指示下，离开草岚子监狱，投身抗日。但是，到了文革却被荒唐地称之为“61人叛徒集团”。尽管当年刘纪原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的父亲陈原道还是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烈士，但他照样要背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

背上这一罪名的人中，还有些是更莫名其妙的。一次，所里正在召开大会，孙永成低着头认真做笔记，突然工宣队一声大吼，专政队的几个人冲到孙的面前，把他抓了出来，说他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根据是他把毛主席像裁成了六六三十六块（或七七四十九块），用图钉钉在墙上。其实，我们这代人人都知道，用图钉往墙上钉肖像、地图、表格什么的，通常要用小纸片折成几层压在图钉下面，免得损坏图像。这位同志大概是用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来做小纸片，“反革命”罪名就背上了。在对他进行批斗的时候，他好像作了辩解，但我也没有听清。批斗完，就直接扭送到“牛棚”被专政了。

食堂炊事员老康，得到这一罪名与老孙相类似。老康是1960年的复原兵，大老粗，没有文化，只会闷头干活，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一次开会，他急着上厕所，顺手撕了半张报纸，正好背面是毛主席像，被他的同事检举了，也糊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

还有几位，因无穷无尽的学习会、批判会开得无聊难受，臭老九的毛病又发作了，顺手扯过几张随处可见的旧报纸，在边边角角的地方胡写一番。本来可能是想练练字，不小心正好和旁边文章中的什么内容对了号，一下子就变成“反革

命”。日记更不能乱写，说不定哪天被有心人看见，拿去一审查，百分之九十九能从中找出“反动言论”。也有喊口号、念报纸不小心念错了的，马上面向毛主席像鞠躬低头，口中连说几次“向毛主席请罪”。这类虽不至于当“反革命分子”，也得灰头土脸好些天，暂时当不成积极分子了。

总之，说话、念报、喊口号都得小心，日记之类是不能再记了，手痒痒也别乱写乱画，对待毛主席像更得一万分地小心。

那些年有一种毛主席塑像，约六七寸高，看着像石膏，实际上是软塑料做的。我家也有一尊。不意阳阳顽皮，把半瓶子紫药水翻倒在这尊塑像上，洗也洗不掉。我吓坏了，赶紧包好藏起来。可是，包起来也不是办法，哪天被发现了还是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处理，就悄悄问隔壁邻居江大菊（她后来因为日记曝光了当了“反革命”）。看我直言不讳，她也推心置腹。原来她也为如何处理一张很旧的毛主席像伤过脑筋：扯碎了扔了吧，若是捡垃圾的发现了去举报，一查就能查出来；烧吧，若是有人闻到味儿，说烧什么反动资料可不是玩儿的。怎么办？只能剪成一小块一小块，从马桶中冲走。我也只能按照她的办法来处理。于是，星期天，趁同套间住户进城看父母，我把叶华明和阳阳支出门去，独自在家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了这项秘密工程。

七

被揪出来的专政对象，被关在“牛棚”中集体劳动，干些挖沟、拉煤、烧锅炉之类的活。专政队的骨干、炊事班刘某，特别会“照顾”这些“臭老九”。男专政对象都睡在木床板上，这位刘某把阮崇德的床板放在水泥地管道井口上面，拿走井盖儿，致使阮以后常年腰疼、久治不愈。那位傻老康，也是因为这位刘某的积极揭发而倒霉的。后来（1969年），我和这位刘某又到了一个军垦农场，刘不久又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宣讲，人称“吹破天”，这是后话。

牛棚中也有女专政对象，每次在锅炉房洗澡时，说是怕她们自杀，不许从里面插上门，而工宣队的马某则常常透过木板的缝隙进行“监视”。女犯们不能不洗澡，特别是每天干完繁重的劳动活之后。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忍受各种羞辱，这点事也算不了什么，但马某这类人的个人品质是让人不齿的。三年后，我从军垦农场回来，听说他因犯流氓罪已经被作为刑事犯专政了。这也是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吧。

我很幸运，没有被关“牛棚”，说是考虑我孩子小，无人照看，不过我想主要是看我小叔叶正光的面子上，他是全国闻名的“916”头头，于是我被派去和清洁工一起打扫办公楼的卫生。我们所五层的办公楼是五十年代末按苏联图纸建造的，质量很好。清洁工也是正式职工，多半是职工家属，她们总是分配我干最脏最累的活，宁可她们聚在一起聊天，也不能让我闲着。这大概便是底层人群几千年来的心态，一旦觉得地位翻过来了，便以这种方式获得心理满足。我整日在垃圾和厕所中忙碌，半天不可能喝口水，整天口渴难忍，只能在自来水龙头下润润口，于是得了膀胱炎，尿常规检查结果是：红血球满视野，小便如洗肉水一样，腹部酸疼。本想休息上几天，叶华明不耐烦地说：请什么假，人家会说你装病偷懒，老实干活吧。谁叫你老子是反革命呢？所以我一直隐忍不敢说，直到8月下放前不久，我告诉了室里的老赵师傅，他才替我申请了10天左右的休息身体，安排家务和整理东西的假。

在文革的浊浪中，人的本性都不自觉地暴露了。犹如在一个大舞台上，每个人的角色不同，但似乎都是不自觉地进行表演；正是这种不自觉的表演，人的善与恶就是那样地泾渭分明。演员中，有刘某、马某之类的宵小，但更多的还是善良的人们。在我遭受批斗期间，在对我的批斗会上，人人都疾言厉色，大声吼叫；在办公区、宿舍区也没人敢和我打招呼，邻居、同事成为路人，我仿佛生活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然而，我还是认为这些人是善良的人，因为我能理解他们。

解放后几乎没有间歇的各种“政治运动”，早已把知识分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更是“史无前例”，除了个别出身和社会关系一点都让人找不到茬的同志外，大部分“臭老九”都是整天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七机部被清理的各种“分子”们，揪出来后倒平静了，坦然了，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倒是那些“知情者”和旁观者压力最大，有被吓得跳楼、上吊，有被吓得生病、流产。我们所就有两位看批斗场面，被吓出精神病，其中一个自杀了。真是“旁观者惊”！

在这样的境况中，你怎么能要求他们给你一点同情的目光，一丝温馨的微笑呢？不像刘某那样变本加厉、落井下石，不像马某那样趁机“占便宜”，就已经是好人了。

八

当然,还有一些人给你的温暖是终生难忘的。六十年代的永定路还算是郊区,周围不少农田、树林,永定河从五棵松北流过。文革浩劫刚开始时,我时常到河边来坐坐,看着那静静流淌的河水,享受一点超脱尘世的宁静。夏天,我也常在午休时候独自到河里游泳,每次都从上游顺水而下,再踏着岸边的土路回到树荫下,默默地坐一会儿。渐渐地,我发现,总有一个男子坐在对岸默默地关注我。我下水他也下水,我上岸他也上岸。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甚至故意不看他,因为我知道他这么做大概是防止我自杀。我当然不会自杀,且不说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就是我独自一人也不会自杀。我当时不相信这样的折腾能长久,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就是被强加罪名的那类人。但是,我对他这份默默地关心,从心底里感谢,也是不能忘记的。后来,我在办公大院也见过这个人,好像是某个厂工艺科的,我也没有详细地打听。现在,我把深藏心中对他的感谢说出来,仍然带着温馨的记忆。

在几乎人人视我为路人的环境中,也有极个别的人,还是偷偷地向我传达着关怀之情。有一次在城里的街上,我碰上了我们研究室另一组的石兆和同志。此前,我与他并不很熟,只是认识而已,他却主动过来和我这个“现行反革命”打招呼。他讲了所里不少新闻,也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其中有些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周密,你千万不能自暴自弃,你还是原来的你呀!我过去没有把你看成多么了不起的高干子女,现在也没有把你看成是多么坏的黑帮子女。他的这番话,让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心里热乎乎的。当时,我就相信,我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们一定和他的想法一样,我还是我!

叶华明受我的牵连,1968年冬也被迫离开研究室去烧锅炉了。他这个人性性格刚强、内向,从不向人诉说委屈、苦楚,承受痛苦的能力也特别强,是个“打掉门牙往肚里咽”的那种人。他也不善言辞,文革以来从未对我说过半句宽慰的话,上下班他也尽量避免和我同行。我们是各自咬紧牙关挺过来的。

转眼到了1969年,批斗会渐渐少了,慢慢也停了。我每天打扫办公楼的厕所、走廊,不与任何人交往,也没人和我讲话。这时期,人们都热火朝天地打派仗去了。

说到文革中打派仗,七机部在全国很有名气,“9.15”“9.16”两大派,威

震北京，波及全国。从1966年12月9日到1967年1月7日，短短的一个月中，发生大武斗5次，受伤住院的几十人，被打的几百人。两派都号称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反派”，每一派都有五六万群众参与。两派各保几个部、院级领导，阵线分明。为了防止对方找到自己所保的部、院级领导，双方都把这些领导藏来藏去，闹得不亦乐乎。派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连周总理都接见了他们好几次，做些调停工作。1969年春末夏初，可能党中央觉得“群众运动”已无利用价值，干脆把北京的不听话的“造反派”们赶到农村去拉倒。七机部除在汉中、河南等地设立干校外，还把几千人分散到全国六大军区的军垦农场劳动。永定路地区分到广州军区。从5月开始，人们就敲锣打鼓欢送下放人员。

这期间，我们室的几位同事悄悄提醒我申请去军垦，说，要是申请能批下来，你就变成“人民内部矛盾”了。我听从了人们的劝告，和老赵师傅谈了，他也帮我努力了一下。于是，1969年8月中旬，我得以随第二批下放人员到广州军区124师在惠阳专区的军垦农场，开始了为时2年8个月的下放劳动。■

【书摘】

文革后遗症的“双重思想”和“认知失调”

徐 贲

2016年5月2日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在希望的田野上”交响演唱会，从整体构思、主题到表演方式、标语口号都毫不掩饰地在为文革摇幡招魂。演唱会引发了公众舆论对文革死灰复燃的忧虑。后传“上头”要求有关部门调查这起演出事件。演唱会主办方说，演唱会在筹备和演出过程中，与他们合作的一方虚构“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提供了虚假材料。这样的辩解自然难以令人信服，有人诘问：“有6000名观众的大型演唱会，从筹划、宣传、排练、舞台布置，声电光调试……总之仅次于央视春晚、文化部春节联欢大型演出，没有一年半载的捣鼓是出不来的，再紧巴，也得好几个月，最终，……演唱会的主办方竟然声明，他们被骗了。”

这个为文革摇幡招魂的演唱会是否有错呢？有错或无错的理由是什么呢？

从一些部门急于撇清与演唱会的关系来看，演唱会似乎是错了，但那不过是因为“上头”过问了。如果“上头”不过问，那就不错了吗？演唱会主办单位承认有责任，但仅仅是没有查证“虚假材料”的责任。倘若材料是真实的，没有虚假材料这一档子事呢？那么开文革演唱会就没错了吗？如果说公开颂扬文革是错的，那是因为我们对于文革已经有了充分的反思？还是仅仅因为文革是一件不便提起的“麻烦事情”？凡此种种无解的问题，显示的都是当今中国人在文革问题上没有是非判断，只有方便权术的官方立场——不能为文革翻案，但也不能批判文革；文革错了，但不能给它的始作俑者抹黑；以文革结束时为界，前三十年是正确的，后三十年也是正确的；否定文革是正确的，不否定文革也没错。这是典型的“后文革”双重思想。

一、“双重思想”与“认知失调”

“双重思想”(doublethink)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首创的一个说法，现已成为英语中的一个标准词汇，美国《蓝登英语大辞典》对doublethink的定义是“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想法或信念”。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英语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在“两个都接受”之外，还加上了一条，“以为两个都正确”，并指出，“这种吊诡在小说中最精炼的表达就是《1984》里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奥威尔所关注的是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双重思想，是权力话语洗脑的结果，洗脑越彻底，双重思想者就越对自己头脑里的矛盾和不一致无所察觉。

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关注人的双重思想现象，称其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认知失调是一种一般社会状态，而非特殊极权社会状态下的双重思想。认知失调指的是，人在同一时间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因而产生了不安的紧张状态。“失调”是两种认知之间所产生的一种不兼容的知觉，这里的“认知”指的是任何一种知识的形式，包含看法、情绪、信仰，以及行为。社会心理学认为，相互冲突的认知会成为一种原初驱动力，强迫心灵去寻求或发明新的思想或信念，或是去修改已在心里存在的想法，好让不能弥合的认知冲突程度减至最低。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用多种实验说明或证明这种原初驱动力的存在和作用。

认知失调理论是“认知一致性理论”(cognitive consistency theory)的

一种，它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于1950年代提出来的。费斯汀格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是一致的，例如，你喜欢一个人，便亲近于他；你讨厌一个人，就疏远于他。但是，有时候态度与行为也会出现不一致，例如，你厌恶你的上司，但是，为了怕冒犯他，或害怕他报复，你不敢表示出自己的厌恶，反而去恭维他，讨好他。在态度与行为产生不一致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个体的内心不适和心理紧张。为了克服这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不适和紧张，人们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来减少自己的认知失调。你每天不得不与你不喜欢的上司相处，每天假装喜欢他，不仅神经紧张，而且心情压抑、觉得自己憋屈窝囊。因此你会告诉自己，我其实也不是那么不喜欢他，他有缺点，但还算是个不错的领导。这么一来，你喜欢他就不是假装的了，更不是违心的拍马谄媚。一旦亲近的行为显得真心实意，可以问心无愧，认知失调也就消除了。

一般社会里的“认知失调”与奥威尔所说的“双重思想”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在这样四个方面。第一，认知失调的矛盾感觉所造成的不适和不快要超过双重思想，而且，认知失调中会有个人“良心”的作用（例如，对他人做了错事，急于寻找自我辩解，以求心安的理由）。相比之下，双重思想（如林彪是毛最好的学生，是副统帅与林彪叛逃，是卖国贼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并不会造成个人的良心不安，也不像认知失调那样引起对自我矛盾的焦虑和不适。

第二，双重思想的矛盾不是个人自己造成的，因此个人没有强烈和迫切的动机去降低和消除它。在双重思想的世界里，人的情感被扭曲，感受不适和不快乐的程度和方式都会与传统价值的社会有所不同，例如，对林彪的“热爱”或“痛恨”都不能适用于一般情况下人们对这两种情感的感受。在不同的极权社会里，双重思维也会有所不同（如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因此，双重思维的特征在于具体环境中的特殊性，而认知失调则在于普通状态下的一般性。从奥威尔和认知心理学家所举的例子中，就可以见出这个不同。

第三，认知失调比双重思维更依靠个人所做的合理化解释，个人的理性也就远为重要。认知心理学关注的认知失调是一种降低和消除人的欲望与理性之间矛盾焦虑的机制。这是一种对自己进行“说服”的机制，在一般的认知失调里，这是一种个人性质的说服机制，例如，我既要健康，又不愿意放弃烟酒嗜好，我就

会说服自己，抽烟喝酒的人许多都是健康长寿的，因此我无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奥威尔所说的双重思想则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在极权国家里，人们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如莫斯科审判中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他们是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但也是叛国贼、老反革命、苏维埃的死敌。一个人在头脑里同时拥有这两种相互抵触的想法，他无须用自己思考所得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对这种事情，不是他个人可以要怎么想就怎么想的，他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小心翼翼地按照官方的说辞和口径来说话，不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

第四，认知失调是在欲望和理性之间进行调适，欲望所坚持和不愿放弃的事情，如果不合理，那就需要找出理由来予以合理化和正当化（往往是私人的理由）。双重思想则是在利益和理性之间进行调适，利益所在，即使违背自己的良知，干出伤天害理的恶事，也会找出许多正当的理由来（往往是政治或社会的理由）。文革中许多行凶杀人或残害他人者并不是天生的恶魔或虐待狂，而是因为参与行凶有利可图，积极、正确的政治表现可以换取许多好处，这才干下了可能与他们良知相违背的事情。但他们并不会承认作恶是出于私利的动机，而是会用“革命热情”“阶级觉悟”“热爱和紧跟领袖”这样的冠冕堂皇之词来为自己的恶行做合理化的辩解。

当今中国的认知失调特征，有的在其他社会中也常见的，有的则是其他社会中很少见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后一种认知失调经常包含着双重思想的因素，与当前中国的政治禁忌和言论管控有关，在文革后遗症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文革怀旧中的认知失调

虽然近年来怀念文革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怀念文革，像“在希望的田野上”交响演唱会那样公开热情颂扬，其实并不多见。国民对文革的灾难记忆并没有完全淡忘，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怀念文革仍然是一件违背人们现有道义忌讳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不是没人会做，但做这样的事情并不光彩，不得不运用暗示而非明言的方式。怀念文革经常会用一种虽不直接颂扬文革，但却明白怀念文革的方式来进行，那就是“唱红歌”。

唱红歌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政治权力组织和推动的唱红歌。红歌不是一

般的歌曲，它是用来当众演唱的政治歌曲。就像戏剧一样，它需要对公众演出才能发挥它的效能，这与个人阅读剧本是完全不同的。红歌需要的是人群效应，它的效应永远是合唱大于独唱，独唱的红歌也需要在有观众聚集的场合演唱。因此，“唱红歌”与“聚众”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而红歌的产生本来就是为鼓动群众和对他们进行宣传服务的，这是红歌的政治基因。

出于怀旧、喜好或别的动机唱歌或者唱红歌，那本来是个人的选择，谁愿意，谁就唱，这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娱乐。但是，红歌的政治基因会让歌者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聚众而歌”心理冲动，政治权力的介入正是利用这样一种心理冲动，而这会根本改变唱歌这一个人娱乐活动的性质。政治权力的介入和高调组织、宣传，这些必然会使得唱红歌成为一种政治活动，甚至政治运动，也因此成为一种思想控制的手段，这是文革的教训，也是为什么几年前重庆倡导的那种高调组织、宣传的“唱红”会令人联想到文革的原因。文革的样板戏和语录歌之所以可怕，并不在于它们直接招人厌恶。事实上，它们有悦耳的音乐和高亢的歌词，很能“提精气神”，但是，在表面的美好词句和精气神后面，隐藏的却是一种仇恨、暴力的政治手段和愚弄百姓的洗脑目的。

用组织化的红歌来标榜文革，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思想：“文革错了”（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文革没错”（文革是“红”的），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认知同时被接受和视为正确。它的特点就是借“红”说事、不说破，但大家心知肚明。在当今中国，不是没有人能看到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但凡能用常识思考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矛盾）。问题在于，有的人即使看到了，也不拿这个矛盾当一回事，明知有矛盾，却依然能坦然为之。这时候，发生的就已经不是单纯的认知失调，而是深深打上了文革烙印的双重思想。

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如今已经步入老年，这一代人中有许多被文革耽搁了青春、庸庸碌碌地过了一辈子，如今生活处境一般，有的甚至相当贫困。他们并没有理由特别怀念浪费了他们大好青春的文革。但是，他们当中也还是有一些人会把文革记忆成一个信仰纯真、理想高洁的时代，自称“青春无悔”。他们并不是文革余孽，而是文革后遗症的认知失调的不幸受害者。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人信仰越是幻灭，或者越是意识到信仰的荒诞（认

知），越是可能会坚持这个信仰（行为或看法），这二者之间是失调的。坚持信仰其实是削弱失调感的一种方式。在社会生活中有一种常见的情形：人为了某个目标作出种种努力，但后来发现结果与原来所期待的相差甚远。面对与期待不一致的结果，有的人不能正确地调整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却坚持原来的看法，甚至变本加厉。这是一种常见的认知失调。

人对某种目标怀着坚定的信念，并为此投入了很多精力，但最终发现那个目标根本没有实现，这会引起很强的失调感。消除这种由于徒劳的努力引起的失调感是很困难的。因为已经付出的努力是不可挽回的，即使改变原来的信念，也无法消除这样的失调感，那就是，我曾为某种信念做出了巨大的付出，但是，事实证明这种信念是不真实的。

这时，人只好寻求其他方式，可作的选择是对已有的事实作少许让步。比如说找些看上去还说得过去的理由为以往事实开脱，或是简单地承认在一些活动中的些许小失误，但总的信念或信仰是正确的。这在文革一代人的往昔回忆和回顾中是常见的。他们有时候也会对年轻时所干下的一些事情表示追悔，如迫害无辜的老师、参加暴力的武斗、出卖和背叛的行为等等。但是，在对事实作出些许让步的基础上，他们当中有的人会以更加坚定的方式信奉原来的信念（如文革所标榜的反官僚特权、打到封资修、大鸣大放民主），并更加努力地宣传它和维护它，以此缓解自己内心中怀有的失调感。费斯汀格指出，以削弱失调感的方式增强人的信念，这种现象可以在历史上的许多群众运动中发现，文革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是很典型的。

增强信念是为了削弱失调感，这也被称作“决策后效应”（*post-decisional dissonance*），指的是，人对几件各有利弊的事情做出唯一的选择是一个决断过程。如果在决断之前，每个事物的价值在决策者心目中大致相近，那么选择者便会觉得难以决断其优劣。但是，在他作出选择之后，他对这些事物的态度评价就会发生改变。文革中的个人其实没有真正“自由”意义上的选择或决策，但却给人以这样的幻觉，每个人都觉得是他自己选择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他对自己选中的事物会变得更加偏爱，对未选中的事物也会更加采取贬低的态度。文革决策后效应的结果是，当年的“选择者”直到今天仍然觉得自己特别热爱毛主席的路线（社会主义），特别厌恶反毛主席的路线（资本主义），他们因此也

成为对文革时代的所谓“公正”“平等”“人心纯洁”特别怀有幻觉和臆想的怀念者。

何亦文在《毛泽东故乡见闻录：祭拜者络绎不绝》一文中记叙道，2016年12月26日他去湖南韶山见证了“纪念毛泽东诞辰祭拜活动”，偶遇文革期间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之弟蒯大海，他称自己是受哥哥之托到韶山，原计划用兄弟的名义送上花篮，未料没有买到。他向何亦文出示蒯大富的名片，背后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卫兵万岁！”“我们永远怀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蒯大富 敬书”。蒯大富在文革后曾被判刑，出狱后曾到深圳在一家照明工程公司任总经理，成为一名“经商致富”者。

文革中流传蒯大富“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的名言。1966年6月，中央大员薄一波来到清华大学，和蒯大富展开辩论。薄一波问：“你叫什么名字？”蒯大富答：“蒯大富。”薄一波说：“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蒯大富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的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只能小富，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群众鼓掌，薄一波哑口无言。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蒯大富的回答很符合他这个红卫兵的“兴无灭资”信念。

蒯大富文革后的个人经商致富显然与他文革时的“兴无灭资”信念不一致，我们无从断定这种不一致是否让蒯大富在内心觉得有什么不舒服或不安。倘若他确实因这两件事情的不一致而感觉到认知失调引起的不安，他的认知失调也可以用以下几种方式来降低或消除。

第一种是改变行为。例如，知道抽烟有害健康，所以戒烟，别人再怎么给你敬烟，也坚决不抽。蒯大富认识到个人经商致富不符合文革精神，因此不去经商致富。按照认知改变行为是最理性的方式，但对不少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种是改变想法或看法，使其与行为一致，例如，我喜欢吸烟，我觉得抽烟的快乐比我的健康重要，所以我不想戒烟。蒯大富如果觉得个人经商致富是对的，以前自己相信的“兴无灭资”文革理念是错的，那么他就会断然否定文革。这也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

第三种是减少自主选择的感觉，让自己相信本人是出于无奈或没有办法才只能出此下策。生活太糟心，压力太大，只能靠抽烟来缓解，别无他法。都抽了一辈子了，戒不掉了。蒯大富可能会说，经商致富是为了生活，对一个服刑期满的

人，这是唯一可行的求生方法。

第四种是改变认知的重要性，让一致性的认知变得重要，也让不一致性的认知变得不重要。例如，吸烟让我放松和保持体型，有利于我的健康，这比担心30年后患肺癌更重要。或者，迄今为止没有科学研究可以充分证明抽烟一定会致癌，有许多抽烟的人活得挺长寿。蒯大富可能会说，个人经商致富并不损害国家利益，而且还是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的体现。

第五种是过度补偿，这是一种缺乏明确意识或自我认识的非理性调适，由于是非理性的，所以经常过度。它起的是对他人的演示作用——让人看的。例如，越是在私底下抽烟，越是在公开场合拒绝别人的敬烟，做出极能自我克制的样子。蒯大富也是如此，别以为我蒯大富个人经商致富就是违背文革精神，就是背叛了红卫兵理念或者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我要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卫兵万岁！”“我们永远怀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三、大娘唱红歌的认知失调

人上了年纪就会怀旧，青少年时唱的歌曲会带回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会不时在上了年纪的人头脑中自然涌现，这是人之常情。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经常是要么不唱歌，要唱就是文革歌（或者其他类似的“红歌”），因为这是他们唯一会唱的歌，在情绪激动时会“自然涌现”。《诗·大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文革那一代人唱红歌，经常是因为一时高兴、心情好，未必表达什么政治想法。但是，人们习惯于将唱红歌的动机政治化，好像每唱红歌必然是因为来了“革命”的兴奋劲。因此，简简单单的唱歌也总是被赋予了热爱和歌颂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动机。不幸的是，那些唱歌本来是图一乐、并无政治动机的人们自己也会有意无意地夸大这种动机。文革中无论什么事情都高度政治化，上纲上线，这种文革后遗症演变出具有中国特有的“唱歌政治”认知失调。

有一篇《在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被骂，当事大妈回应了》的报道说，中国大妈组团去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消息传开，有人指责说，“这群大妈是公款旅游，是跑到美国‘丢人输出价值观’”。报道引用一位“刘大妈”的话说，第

一，团友们旅美“完全自费”；第二，报名参加前彼此并不认识；第三，他们都是普通百姓，“有医生，有老师，她则是一名已经退休的幼儿园园长”。尽管刘大妈把话说得这么清楚，还是有网友在跟帖里怀疑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妈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词”。指责者显然将大妈们的唱歌动机政治化了，然而，大妈们自己也是一样。双方都突出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的动机。所不同的是，大妈强调唱红歌是出于普通人真诚的个人爱国动机，而指责者则是暗示，唱红歌是既得利益者（干部家属）的歌功颂德。

说实在的，怀疑归怀疑，确实不能证明这次唱红歌有官方背景。刘大妈在对记者解释时郑重回应说，“我们是自费旅游，也根本不是有人资助或者有什么背景。”可以相信，刘大妈说的是真话。普通老百姓在纽约唱红歌，倒真的是可能比有组织的，有背景的人更会觉得自己是在真心赞颂社会主义，也更需要觉得是这样。这看上去很奇怪，但却符合中国普通百姓认知失调的特征。

费斯汀格和另一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默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心理实验。他们让71名实验参与者重复做一件极为枯燥单调的事情，参与者们当然都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参与者们被要求去劝说自己的朋友也来做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的事情。参与者们有的得到1美元的报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报酬。

所有参与者们都被迫陷入这样一种认知失调，“我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很有趣，而实际上我觉得它非常无聊”。这明明是在说谎，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报酬的人在说谎时更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更容易相信，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说的，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那些得20美元报酬的人却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了钱才说的谎，因此反而更愿意承认“我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这个事实。

得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20美元报酬的人更积极言不由心地劝说别人，当然，他们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由心”。他们因为没有金钱利益的动机，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没有说谎，以平息自己的认知失调。但是，得20美元报酬的人则不需要平息这样的认知失调。

试想，如果这次唱红歌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费旅美的组织活动，唱歌是他们的工作任务，那么，他们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务。唱歌并不一定需要用真诚热爱

社会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反倒是普通的百姓，他们犹如“自干五”那样，自己掏钱买机票、食宿自理，还把有限的旅游时间花在唱红歌上，倘若不是觉得因为真诚热爱社会主义才唱的红歌，岂不等于自己承认是犯傻和丢人？唱红歌的大妈们不但不觉得自己犯傻，反而觉得光荣，这便能平息她们的认知失调。然而，许多旁人不认同她们这种行为，那是因为他们身处于认知失调的情境之外，所以觉得那是一种非理性和奇怪的行为。

其实，一群中国游客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见多识广，见怪不怪的纽约人也许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件事在中国反倒成为新闻和公共话题，或许是因为人们从这件事联想到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例如，有人一边想方设法自己或让家人移民国外或在海外置产，一边却狂热地爱着中国，骂着美国。这样的行为也许不能简单地用虚伪或表里不一来解释，而是可以从认知失调来进一步探讨其社会心理的原因。

四、文革后遗症的双重思想的认知失调

正如奥维尔在《1984》里所描绘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产生普遍认知失调的制度，它强迫所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长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形成自动化的双重思想心理机制。文革最严重的后遗症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人人带着假面生活的谎言社会。李慎之曾说：“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⁵ 这种改造岂止始于文革，叶浅予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⁶ 今天，说假话，假装你和大家一起说的假话，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这是文革留下的一种严重的后遗症。双重思想是一种由意识形态主导的特殊假话，它的作用不在于让人们把虚假的误解当作真实的，而在于使真实改变无法表现出来。

文革后遗症双重思想的一个显例就是对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判断与评估——人们无法真实地知道毛泽东的政治遗产究竟是什么。毛泽东自己认为，文革是他

⁵ 吴远鹏：李慎之先生论“文化大革命”，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18-2.html>，2017年2月7日。

⁶ 《历史：不说真话能死吗》，<http://tieba.baidu.com/p/4453045337>，2017年2月7日。
<http://chuansong.me/n/1509086852619>，2017年2月7日。

的一个主要政治遗产，他生前最害怕的就是会出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害怕在他死后文革会遭到否定。赫鲁晓夫否定的不是斯大林思想的某一部分，也不是斯大林的某些事实成就（如卫国战争），而是斯大林本人。毛泽东害怕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害怕文革被否定，也是害怕，即使他有建国的成就，有一天他本人也会被完全否定。毛没有估计到的是，他没有被否定，不是因为有人成功地捍卫了他的文革，而是因为文革四十年之后，出现了两种同时正确的矛盾观念——不能否定毛，但也不能肯定他的政治遗产。这两种政治观念同时存在，也同时正确，成为奥威尔所说的双重思想。

这样的双重思想助长了今天民间的“毛泽东崇拜”，今天的毛泽东崇拜，不同于文革中对他的个人崇拜，但与此有所关联。丹尼尔·利斯（Daniel Leese）在《毛崇拜：文化革命中的修辞与仪式》（*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一书里指出，文革时的毛个人崇拜，看起来荒诞，其实有着理性的内核。这是一种功利性的崇拜，从毛本人到地方官员再到普通民众，都利用这种崇拜来达到各种不同的利益目的。今天，毛泽东崇拜同样是功利性的，并不只是愚蠢、疯狂或非理性的表现。功利性的崇拜与宗教的崇拜貌合神离，它只是向神祈求的恩赐和实惠，而对神启示的至高、至真、至美、至善的灵魂境界却未必感兴趣。

文革后的今天，对毛的活人个人崇拜变成了对死人的偶像崇拜，崇拜对象包含着信众对魅力型强人和青天政治的期待，对一些现实状况的不满，以及衬托不良现状的毛时代“美好生活”回忆。网上流传的《生活在毛主席时代！谁总结的？太精辟了！》包括“综合篇”“工人篇”“干部篇”“教育篇”“医疗篇”。⁷以下是《综合篇》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幸福不是吹出来的。
红旗飞扬歌声嘹亮，莺歌燕舞欢笑不断，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小河甘泉流水潺潺。
一分钱打来酱油醋，一分钱买来两根针，
一分钱拎捆小白菜，一分钱抽上两支烟，

⁷ 《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物价稳定生活无忧，货真价实童叟不欺。
兴办国营集体企业，满大街少见闲逛的，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全员上岗没失业的，
退休工资不迟发的，生老病死有依靠的，
少见儿女不养娘的，老有所养是应该的，
人民是安居乐业的，男女老少心情欢畅。
鸡犬之声是相闻的，邻里之间是真挚的，
同事之间是坦诚的，互称同志是正常的，
陌生人是能讲话的，不相识也打招呼的，
交往没尔虞我诈的，日记是没人偷看的，
上下级间是友好的，工作中互相帮助的。
规定是令行禁止的，执行是雷霆如雷的，
百姓是遵纪守法的，恋爱婚姻是心仪的，
学习雷锋是高尚的，尊老爱幼是应该的。
没有灯红酒绿楼的，没有敢狐假虎威的，
人人本分没邪念的，家家正经没乱来的，
工作按时上下班的，各行各业没欠薪的，
入党团不用送礼的，社会没有潜规则的。
邻国是不敢覬覦的，山姆要赴京觐见的，
是承认三个世界的，恢复联合国席位的，
与百余国家建交的，我们朋友遍天下的。

这么美好的生活有如人间天堂，怎么不令人憧憬和怀念？有这么美好的生活，全都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谢毛主席，崇拜毛主席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不管“回忆”如何美好，时代毕竟变了。文革中的领袖崇拜已经变化成为今天的“神人”崇拜。领袖崇拜的信徒是“革命群众”，神人崇拜的信徒是“信男信女”。领袖崇拜是一种体制性行为，体制需要“核心”，核心一换，个人崇拜也就会旧去新来。神人崇拜是一种大众心理行为，只要老百姓敬佩或崇拜谁，谁就可以是他们心目中的神人。刘禹锡诗曰：“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

尽为神”，关羽、赵云、张良、诸葛亮、郑成功都有供奉他们“神位”的庙或寺。

四川省绵阳市南山有座很小的寺庙——红恩寺。这个小庙除了供奉着一般庙宇常见的菩萨外，还供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塑像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十大元帅等画像。庙门口对联是“打天下坐天下人人都很拥护他”“打江山坐江山全国人民都喜欢”，横批是“真龙天子天下为公毛主席万岁”。这座庙里的毛崇拜里就有文革个人崇拜遗留的因素，同时混杂着佛道信众的迷信——毛成了一尊新菩萨。中国民间从来就有“富烧香穷拜佛”的说法，另一个类似的说法是“富烧香穷算命”。烧香是事情诸事顺遂时还愿或感恩，而拜佛或算命则是在命运多舛或潦倒困顿时的求助或求变。后一种人祈求无果，经常不会就此放弃信仰，而是反而会信念弥坚，觉得祈求不灵是因为祈求得还不够。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最初察觉的信众迷信。

1950年代，费斯汀格偶然读到一篇报道，题为《来自克莱伦行星的向我们城市的召唤预言：逃离洪水》，说的是芝加哥的一位名叫玛丁（Dorothy Martin）的家庭主妇（人们称她为Sister Thedra），她是一个叫“追求者”（Seekers）的地方教派的组织人，她向她的信众们宣称，在1955年12月25日，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费斯汀格随后和他的学生来到这个地区，潜伏在这些信徒中观察他们的行为。费斯汀格后来在与他人合著的《当预言失败时》（*When Prophecy Fail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6）一书里记录了他对这个教派信众日常行为的观察。

据费斯汀格记录，“追求者”为世界末日做了一切准备，辞去了工作、变卖了家产，甚至把裤子上的铜拉链都剪掉了，以免妨碍飞碟的电子通讯。结果，当那一天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按理说，这些受骗的人应该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心理推断的预料，这些信徒不但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和虔诚，他们相信，世界没有按原计划毁灭，是因为他们迎接死亡的虔诚态度感动了上帝。“追求者”们甚至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一贯低调、不愿与外人来往的作风，变得热衷于宣扬他们的教派信仰，到处加倍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教派的正确。

信徒们坚信自己的信仰，期待自己能因此从困顿的逆境中解脱出来，但这个目标就是不能实现，这会在下意识中引起令人焦虑和痛苦的失调感。消除这种失

调感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自己，我的信念还不够坚定，我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诚心诚意。这是一种认知偏误，认知心理学称其为“努力捷思”（effort heuristic, 误以为投入的努力越多，就越是会有好的结果），又叫“投入升级偏误”（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bias, 越是事与愿违，越是不愿回头或转向，非一条道走到黑不可）。今天，许多把毛当偶像或神来崇拜的都是一般的底层民众，他们退休难、医保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和就业难、死了下葬难。他们对今天的贫富不均、无官不贪、是非不明、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等社会现象胸怀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希望有毛泽东这个“厉害”的神人来匡正时弊。这种愿望实现的可能越是遥远和缥缈，他们就越是怀念毛泽东，越是相信他的神力。他们从来不想想，神人既然这么灵验，怎么能让自己的虔诚信众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

这样一种认知偏误经常伴随着具有“文革后”特色的双重思想，那就是，同时拥有两个关于毛时代文革的互相矛盾信念，并把两个都当成是真实的：毛泽东是大救星、毛时代过的是苦日子。今天，即便崇拜毛的底层民众，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生活过去几十年也发生了文革时代人们想都不敢想的变化，他们也不见得愿意回到文革那种缺衣少食、只有8个样板戏、早请示晚汇报、阶级斗争人人自危的生活状态中去，更不要说是回到“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个饿死人的年代了。

认知失调会造成心理伤害，让人在内心觉得焦虑、自相矛盾、啼笑皆非、不快乐、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用某种方式降低或消除认知失调，以恢复精神安顺和心理上平衡。然而，正如费斯汀格提出的，人在减弱或消除失调感的过程中，一般对自己的心理活动状态缺乏明确的意识，因此呈现出臆测或幻想的特征，当事人所诉诸的是自我欺骗的方式。在一个认知失调普遍化的社会里，人会变得难以独自保持健全的思考，因此诉诸自我欺骗的认知失调会成为一种被“共同确认”的思维方式，也会被错误地当成是一种正常状态。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健全的社会》一书里说，“人们在观念上的‘共同确认’（consensual validation）非常具有欺骗性。由于大多数人共同具有某些思想或感情，就以为这些思想或感情是正当的，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我们可以说‘两个人发了疯’，也可以说‘上百万人发了疯’。数百万人都有同样的恶习，这并不能把恶习变成美德，数百万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数百万人都患有同样的精神疾病，这并不能使这些人变

成健全的人。”¹同样，数百万人都认知失调，这并不能使认知失调变成可以接受或值得庆贺的正常状态。文革后遗症越是使众多中国人罹患认知失调，我们就越是不能忽视了这个国民精神的普遍疾病。²

（启之主编《中华学人文革研究论文集》第二卷，美国华忆出版社，2019）

【读者来信】

1. 许浩

方先生：希望您不要悲观，还是有相当数量的90后在阅读每一期杂志的，我就是其中一员。希望贵刊能越办越好。

2. 余敏玲（台北）

必须感谢您的拔刀相助，让《记忆》能够继续经营下去。

我认为目前年轻人不感兴趣，不用气馁。怕的是将来他们想看的时候，没有贴近史实的资料可读。这是《记忆》存在的重要功能之一。

3. 黄孝华

谢谢发来291期，又是精彩的一期，特别推崇楚天江和于向真的两篇佳作。从《记忆》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

4. 庄菁瑞（荷兰 阿姆斯特丹）

你们能坚持到现在实属不易，新年新气象做些改变是正确的时空巨变中要生存不调整自身是不可能的。

5. 于向真（新加坡）

我认同调整栏目，扩大视野与包容度，力求在纷争乱象中探寻前进共识，让更多人从内心自觉抵制开倒车。这是有历史责任担当的人们的当务之急！

6. 熊猫国王

谢谢方老师始终的坚持，调整有必要，话域的确也需要更新。希望新的一年《记忆》能够有新的面貌，也期待新的《记忆》更有看头。

7. 蒋健

291期首篇提到的六条可检讨之处，诸条之后应该用分号，而全用的是逗号。另，50页上“现在有些人杠起华国锋同志的旗帜”一句中的“杠”应为“扛”。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